

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

馆刊



2009年
第2期

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馆刊

二〇〇九年第二期
(总第二期)



目录

研究与探索

- | | | |
|----|-------------------------------------|-----|
| 4 | 浅谈宋庆龄与英国援华会 | 王宁宁 |
| 14 | 心中装着国家 心里想着人民
——记宋庆龄和她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 | 夏义坤 |
| 18 | 听“小先生”讲那过去的故事 | 蒋蕊华 |

馆建工作

- | | | |
|----|----------------|-----|
| 20 | 纪念馆与社区文明 | 倪青燕 |
| 22 | 对本馆后勤保障工作的几点认识 | 王家野 |
| 24 | 关于我馆扩大影响的浅见 | 丁灵敏 |

宣教论坛

- | | | |
|----|------------------|-----|
| 26 | 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接待手记 | 傅 强 |
| 28 | 参加旅游博览会后的思考 | 吴颖嫣 |
| 30 | “追寻宋庆龄的美德”征文比赛随想 | 许毅捷 |
| 32 | 接待久保田夫妇 | 仲灵颖 |

陈展天地

- | | | |
|----|------------|-----|
| 35 | 谈谈博物馆的临时展览 | 傅 强 |
|----|------------|-----|

主 编 陆柳莺
副主编 董 卫
 倪青燕
策 划 麦灵芝
执 行 王宁宁

2009年7月

contents

馆藏研究

- 38 一张照片的考释 宫洁菁
42 印度镶银铜盘 麦灵芝
44 宋庆龄对《复始之旅》不实描述的意见 郑培燕

文保之道

- 50 谈谈名人故居的建档工作 麦灵芝
52 故居陈列文物的除尘 方国富
54 故居古树名木的养护 周美琪

藏书选译

- 57 《个人的历史》选译 郑培燕

图版

宋庆龄珍藏的青花瓷器

主办单位

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

地址

上海市淮海中路1843号

邮编：200030

电话：021-64727982

传真：021-54654810

网址

www.shsoong-chingling.com

投稿邮箱

wnn0828@163.com

浅谈宋庆龄与英国援华会

撰文/王宁宁

英国援华会在二战期间成立，其领导人克里普斯夫人和米勒夫人与宋庆龄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抗日战争期间，英国援华会给予中国许多精神和物质上的援助。1946年，受中国政府邀请，克里普斯夫人带领英国援华会成员访华，对其救济的各处予以考察，以期继续援助中国。来沪期间，与宋庆龄会面。但后因种种原因，克里普斯夫人工作重点逐渐转向中英友好协会，即从文化教育方面援助中国，英国援华会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

一、英国援华会的建立

伊泽贝尔·克里普斯（Isobel Cripps），是英国知名的海外援助的组织者。她出生于白金汉郡，是父母的第二个女儿，也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她的父亲是德海姆庄园的主人哈罗德·威廉·施文森班克（Harold William Swithinbank），母亲艾米（Amy）是水果盐的发明者詹姆斯·科劳斯勒·恩诺（James Crossley Eno）的女儿。伊泽贝尔在爱斯科附近的赫思费特学校接受了私人教育。1910年1月伊泽贝尔初遇斯塔福德·克里普斯（Stafford Cripps）⁽¹⁾先生。当时克里普斯先生的父亲查尔斯·克里普斯（Charles Cripps）正热衷于竞选英国议会下议院的保守党代表，斯塔福德是父亲竞选的支持者，而伊泽贝尔是当时竞选活动的助手。两人很快坠入爱河，于1911年7月

12日在德海姆教区的教堂结婚。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斯塔福德·克里普斯访问印度、中国，苏联及美国，回到英国后，在其日记中记下了当时中国哀鸿遍野的场景，克里普斯夫人读过后，对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1942年，英国驻华会督何明华（Ronald Owen Hall）主教⁽²⁾自华返英，深深同情中国人民的处境，向英人呼吁援助中国。当时他在英国进行的公开广播，申述了中国人民的苦难，希望筹款50万英镑作为援华费用。英国人民积极响应，不久便募得36万英镑。在何明华主教的感召下，6月，英国政府决议成立英国援华会。克里普斯夫人担任了这一组织的主席，伊丽莎白·弗兰克兰·摩尔博士（Dr. Elizabeth Frankland Moore）（那时的名字叫米勒夫人）被选为组织的秘书长。英国当时包括爱尔兰、苏格兰，共有1700余城市，其中1600余处均设有分会。到克里普斯夫人访华期间，该组织为中国募集了180万英镑。

米勒夫人是一位传奇女性，一生经历许多挫折。在她小时候，一次意外的事故让她的父亲变成一位盲人，14岁时父亲不幸离世，她的母亲努力维持着家庭生计，生活非常困苦。后来全家移居印度，在那里广袤的土地上，她所生活的地方经常找不到一个欧洲人。幸运的是她学会了印度语，懂得了贫穷的艰辛，知道穷人缺什么，这对她以后的工作很有帮助。在印度，她在加尔

各答大教堂结婚，这是她的第一次婚姻。1934年，在印度生活了7年之后，她回到英国。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做国际计划生育协会的秘书。后来，她受邀加入劳埃德·乔治的行政内阁，这让她有了不同寻常的历练。英国下议院议员埃莉诺·瑞斯伯恩（Eleanor Rathbone）欣赏她的才华，请她担任自己的行政秘书。二战在英国造成了至少4万名难民，瑞斯伯恩的工作很大程度上与救济难民相关。米勒夫人很快投入工作，克服重重障碍，在英国遭受炮轰之前，安全地将4000名巴斯克难民护送回西班牙。1942年英国援华会成立以后，她被聘任为秘书长。

1946年10月，担任英国援华会主席的伊泽贝尔和秘书米勒夫人一起来到了中国。

二、克里普斯夫人来华

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克里普斯夫人和米勒夫人应中国政府之邀访华。在这次延续将近两个月、横跨3万英里的旅程，她们走访了中国的许多城市和乡村，视察了战争期间援建中国的项目。

笔者从当时的报纸中⁽³⁾整理出了克里普斯夫人访华的行程表（见下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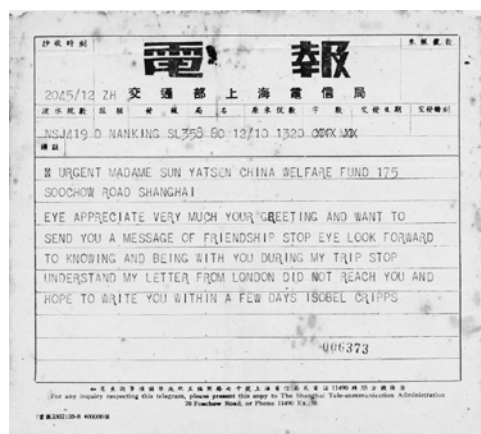
1946年9月18日宋庆龄在致函格雷斯的信中提到，“克里普斯夫人将在十月三日到达，她可能会去参观我们设在那里的国际和平医院。我希望有机会同她一道去参观。”

⁽⁴⁾但克里普斯夫人真正启程是在10月5日拂晓⁽⁵⁾。经过三天的颠簸，8日下午，克里普斯夫人一行到达香港，国民政府早在前一日就派出专机美龄号到港迎接。9日，在代理欧洲司长叶公超的陪同下抵达南京。克里普斯夫人在南京共逗留了四天，受到了隆重的欢迎。1946年10月21日的美国《时代》杂

志称：“英国援华会主席克里普斯夫人与她的女儿上星期来到南京，带来英国人民美好的善意、善行和善心。她们为蒋夫人准备的24道餐后甜点，为孙夫人准备的一套40件瓷茶具。中国人民非常热情地欢迎她……”11日上午，克里普斯夫人在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后，前往中央大学参观，中午赴吴贻芳博士宴，饭后参观了金陵大学及女子文理学院，并赴新运妇女指导大会茶会，晚八时她又赴国民外交中英文协会晚宴⁽⁶⁾，异常忙碌。12日上午，克里普斯夫人接见了中共代表团董必武、王炳南，克里普斯夫人详细询问了共产主义地区的劳工运动和工人组织，表示对共产主义地区的兴趣，希望参观孙夫人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资助的几个国际和平医院和设立的孤儿院。⁽⁷⁾她随后参观了卫生署，中央医院，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等卫生及救济机关，中午参加卫生署金宝善署长、社会部谷正纲部长主持的午宴。这天中午，克里普斯夫人给宋庆龄发了一封电报：

10月12日13：20分从南京发的电报

非常感激你的祝贺。在此送上我的友好的讯息。我盼望着在我的旅途中能与你相见。得知你没收到我从伦敦寄出的信，希望



克里普斯夫人来华行程表

时间	行程
1946年10月5日	由英国前往中国
1946年10月8日	到达香港
1946年10月9日	抵达南京
1946年10月11日	召开记者招待会，参观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及女子文理学院等
1946年10月12日	接见中共代表团，观了卫生署，中央医院，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等
1946年10月13日	出席英国援华会顾问委员会第十九次常务会议
1946年10月14日	前往重庆，召开记者招待会
1946年10月15日	视察重庆广益中学及仁济医院等
1946年10月17日	前往内江、流井等地
1946年10月18日	赴乐山
1946年10月19日	抵成都
1946年10月21日	参加成都妇女团体组织的欢迎会
1946年10月24日	赴兰州，参观中国工合国际技术委员会水利计划，全国防疫局等
1946年10月28日	由兰抵太原、后飞延安
1946年10月31日	赴郑州，参观工谊救护队，河南国际救济委员会设施及儿童保育院等
1946年11月2日	到北平，参观3日
1946年11月6日	飞沈阳，参观各学校
1946年11月8日	返回北平
1946年11月9日	游天坛，访问军调部吉伦将军夫人
1946年11月10日	邀请燕京、北大、清华三大学校长会谈
1946年11月12日	参观养老院、育幼院及辅仁大学农业试验学校，救济院儿童部等
1946年11月13日	召开记者招待会
1946年11月14日	飞抵上海
1946年11月15日	召开记者招待会，中外救济团体在美国社交会堂举行茶会招待等
1946年11月16日	参观江湾陆军医院，晚在上海电台对外发表广播演说
1946年11月18日	赴漕河泾难童教养会，出席英国驻沪总领事奥格登夫妇之鸡尾酒会
1946年11月20日	抵南京
1946年11月21日	赴蒋介石官邸辞行
1946年11月22日	召开记者招待会
1946年11月23日	参观国民大会堂、宋美龄到机场送行，抵广州
1946年11月24日	举行记者招待会，参观黄花岗、中山纪念堂、中大习艺所
1946年11月26日	自广州火车站乘火车抵香港
1946年11月27日	在港举行记者招待会
1946年11月30日	由香港飞加尔各答返英

几天内再给你写信。

从这封电报我们可以得知在克里普斯夫人来华后，始终与宋庆龄保持着联系，两人都期待着在这次旅程中相见。当晚，克里普斯夫人偕米勒夫人出席了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励志社大礼堂举行的宴会，蒋介石于席间颁赠克里普斯夫人特等大绶景星勋章⁽⁸⁾一座，米勒夫人六等景星勋章一座，以酬谢英国在二战期间援华的功绩。⁽⁹⁾13日，克里普斯夫人出席了在蒋介石官邸举行的英国援华会顾问委员会第十九次常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杭立武主席，克里普斯夫人的女儿佩琪，秘书长米勒夫人，英国驻华大使施谛文⁽¹⁰⁾夫妇，俞鸿钧部长，英国援华会驻华代表陈纪彝女士等，对援华会的业务方针以及一亿一千万款项之分配作了讨论。这次会议持续了一天，晚上克里普斯夫人出席外交部长王世杰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宴会上，王世杰做了欢迎词，感谢克里普斯夫人援华之成绩。为了更好地理解英国援华会的作用，现摘录一段当时王的致词：

另外最堪注意的一点，是克里普斯夫人所领导的援华总会捐到巨款，虽已给吾人深刻的印象，但本人以为援华总会，经由无数支会所主办的演讲会、展览会、和刊物，拿战时的中国和中国民众亲切地介绍给英国的民众，更伟大。⁽¹⁰⁾

由此可知，即便在当时，克里普斯夫人所领导的英国援华会对中国的帮助，给人印象最深的也并非只是物质上的援助，它更重要的是向英国民众宣传介绍了中国，让两国人民在精神上有了共通和交流。

克里普斯夫人此行参观解放区的行程是非常引人关注的。她在南京召开记者招待会时，就谈到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此

次目的在考察援华捐款所作之用途，并作如何发展来日业务之参考，更希望因此增进两国间友谊。共党区域内，很想前往视察由援华会补助设立之国际和平医院之情形。”

⁽¹¹⁾10月28日上午，克里普斯夫人偕秘书米勒夫人、小女佩琪一行于10时50分由兰州飞抵太原，停留至午后一时一刻乘美军飞机，直飞延安。⁽¹²⁾毛泽东、朱德及夫人及其他中共要员均在机场欢迎。当晚由边区政府设宴洗尘，延安各界名流二十余人作陪。29日上午，克里普斯夫人等一行参观了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总院，洛杉矶托儿所、第一保育院及总门诊部。下午，与在延安的解放区医药界、保育界举行座谈。30日上午，克里普斯夫人接见了解放日报、群众报及新华社记者，克里普斯再一次谈到了来延安的原因：“我来延安想知道更多一些，因为延安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延安和别的地方是被隔离的，我觉得此次如果不来延安，对于我的旅行是不圆满的。我了解解放区有何困难和中国各方面一些情形，以便更好的援助中国”。政治问题是克里普斯夫人每到一处都必须回答记者的问题。但克里普斯夫人认为“如要谈政治，则非待逗留十五年以上不可”⁽¹³⁾，始终强调希望中国早日获得和平。在解放区也不例外，当问到对于今天中国的内战和美国当局援助国民党独裁政府有何意见时，克答“恕我不能对政治问题有所评论，但毫无疑问的中国在经过了一次艰苦战争之后，现在又处于悲惨的境地。我深深地同情中国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我将就在华视察所得，向英国人民作忠实与公正的报导。但我以为中国要达到和平，需要双方有更大的忍耐”⁽¹⁴⁾。30日晚，毛泽东、朱德设宴招待，中央礼堂举行了盛大的欢迎晚会。当朱

研究与探索

德夫妇陪同克里普斯夫人等人入会场时，会场向他们致以热烈的掌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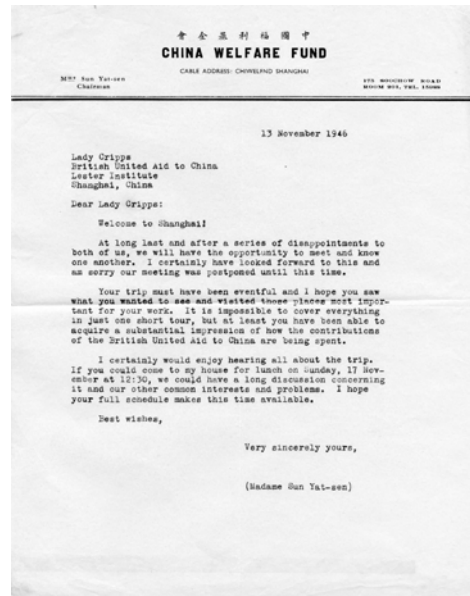
在此次旅行中，克里普斯夫人对与宋庆龄会面一事非常期待，但这种会面又一波三折。故居所藏的另外一份电报说明了这点。

10月23日16:20分从成都发给宋庆龄的电报：

得知你不能在北京与我见面，我感到非常遗憾。我们准备从兰州到延安去。所以非常遗憾我们不能在启程前带上你的代表。如果你能仍然考虑在北京会面的可能性，我将非常感谢你。私人的会见还是安静些好，上海的安排都非常正式和紧促，所以请你回复给我的朋友郑州华北医院的山姆。伊莎贝尔·克里普斯

克里普斯夫人非常希望在北京就可以见到宋庆龄，这是因为北京的日程较为宽松，有时间可以进行一些安静的私人会面。上海因为一些官方的接待和参观事宜，始终较为嘈杂。但即便是克里普斯夫人两次到达北平，都没能如愿以偿地见到宋庆龄。对于会面一事，宋庆龄仍然希望在上海举行。11月13日，宋庆龄给克里普斯夫人写信，邀请其来参加11月17日中午的家宴。

电报	交通部上海电报局
电报号	10225
发报人	P. CRIPPS
收报人	SHANGHAI
电文	FOLLOWING FOR MADAME SUN URGENT AND PERSONAL REGRETS SO VERY DISAPPOINTED YOU ARE UNABLE TO MEET ME IN PEKING WE ARE GOING TO RETURN TO SHANGHAI THEREFORE VERY MUCH REGRET UNABLE TO PICK UP YOUR REPRESENTATIVE BEFORE PROCEEDING STOP I WOULD VERY MUCH APPRECIATE IF YOU COULD STILL CONSIDER POSSIBILITY OF PEKING AS SO SOON QUITER FOR PERSONAL VISITING SHANGHAI PROGRAMME OFFICIAL AND CROWDED STOP PLEASE REPLY TO FRIENDS FRANCE HOSPITAL CHONGMING ISLAND CHANGSHU BRIDGE



克里普斯夫人

英国援华会

雷士德医学院

上海 中国

亲爱的克里普斯女士：

欢迎你来上海！

经过连续的失望之后，我们终于有了见面和相互了解的机会，我对此盼望已久，很遗憾至今才得以实现。

你这次访问一定有着丰富的经历，我希望你已经见到了你想见的一切，并且参观了那些对你的工作至关重要的地方，短暂的旅行不可能面面俱到，但至少你可以获得真实的印象——英国援华会的捐助在这里是如何被使用的。

我将高兴地听取这次旅行的所有情况。如果你能在星期日（十一月十七日）十二时三十分来我家用午餐，我们将能就此长谈并讨论我们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希望你能在百忙中拨冗光临。

祝好

你诚挚的宋庆龄

1946年11月13日⁽¹⁵⁾

11月14日，克里普斯夫人一行乘建国号飞机抵沪，飞机降落在江湾机场。孙夫人宋庆龄女士、吴国祯市长夫妇，外交部陈国廉主任、妇女会张霁真女士，英国驻沪总领事奥格登夫妇等三十余人到机场欢迎。克里普斯夫人身着淡咖啡绒毛外衣，黑色衣服，黑围巾，黑呢帽，同行者有女儿佩琪，援华会秘书长米勒夫人等。克里普斯夫人下机后即与孙夫人及各欢迎者握手问好。略事寒暄后，乘市长所备车辆赴市长官邸休息，并下榻该处。15日上午，在市长官邸招待中文记者后，11时克里普斯夫人亲赴英国援华会上海分院参观，下午中外救济团体在美国社交会堂举行茶会招待⁽¹⁶⁾，晚上参加了在市长官邸举行的隆重公宴。⁽¹⁷⁾

16日上午克里普斯夫人赴江湾参观陆军医院，随行者有英国援华会秘书朱兰夫人，女儿佩琪，英援华会驻沪主任哈礼士等，由军医署署长林可胜将军及院内各级人员予以招待。克里普斯夫人巡视各部门后，对医院内各种设备，颇表关切，林可胜将军一一作了讲解。在院内用完午餐后，下午上海妇女团体在西爱咸斯路75号以茶会招待克里普斯夫人，晚上在上海电台对外发表了20分钟的广播演说，后由英国太古公司经理夫妇在虹桥路私邸招待晚宴。⁽¹⁸⁾18日上午，克里普斯夫人赴漕河泾难童教养会，下午出席了英国驻沪总领事奥格登夫妇之鸡尾酒会⁽¹⁹⁾，中英文化交流协会和留英学生联合会亦出席欢迎英国援华会主席克里普斯女士。宋庆龄、吴国祯市长夫妇均参加了此次宴会。⁽²⁰⁾19日晚出席了英国商会会长思威之晚宴。⁽²¹⁾

可见，在克里普斯来沪的这一个星期，



宋庆龄等在江湾机场迎接克里普斯夫人

宋庆龄期望与克里普斯夫人有一些“亲密接触”，但是正如克里普斯夫人在电报中说的，她的行程十分紧张。报纸上没有披露克里普斯夫人17日的安排，在宋庆龄的书信中也再未提到这次会面，因而可以判定二人最密切的会谈只可能是在18日奥格登夫妇举办的鸡尾酒会上。30日，克里普斯夫人离港返英，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她与宋庆龄以后的交流也只能在通信中找到些许痕迹。在这次旅行中，克里普斯夫人对英国援华会所援助基金之用途，得到了直观的了解，对各地慈善救济机关的办事能力表示满意。她在对记者的谈话中表示英国援华会将继续援助我国，借教育与宣传促进中英友谊，沟通文化，增进合作，促进世界和平的建立，这也为后来克里普斯夫人工作重心的转移做了铺垫。

三、宋庆龄与英国援华会的分歧

在克里普斯夫人离开中国后，宋庆龄努力地与英国援华会保持联系。这不仅出于宋庆龄争取更多援助的需要，还与周恩来对宋庆龄建议有关。1946年12月17日，周恩来致函宋庆龄，阐明现在美国独占资本企图独占世界的局势下，中英两国人民的合作的重要

性不亚于中美两国人民的合作，甚至英政府中的左派我们也必须努力与之合作，以孤立英国政府中专门追随美帝国主义的反动分子。⁽²²⁾这一建议使得宋庆龄非常重视与英国援华会的关系。1947年6月24日，宋庆龄致函丹尼斯·弗罗恩（Dennis Frone，英国援华会工作人员），感谢英国援华会为国际和平医院捐款七百五十英镑。⁽²³⁾尽管克里普斯夫人始终强调英国援华会的公平态度，但它始终是一个政府性的组织，因而很难保持中立。在内战愈演愈烈之时，他们对中国的援助方式产生了变化。通过1948年宋庆龄与英国援华会领导人的几次通信，可以看到一些分歧。

1. 宋庆龄对英国援华会所采取的“奖学金和交换技术”的援助方式持保留态度。

在1948年1月6日，宋庆龄致克里普斯夫人函中，她提到“我们这些身在中国的人们都在设想，狄克逊先生所规划的关于学生和技术人员进行交流的新计划就要付诸实施了。我们衷心希望这个活动取得圆满成功，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活动是有很意义的。我个人将怀着浓厚的兴趣注视着这项交流计划的实施。”⁽²⁴⁾此时宋庆龄对英国援华会所采取的交流计划并不反对，而且还认为此项援助意义重大。但耐人寻味的是3月12日宋庆龄复函米勒夫人时说：“把香港作为实施你会交换奖学金工作计划的启动地点之一是令人感兴趣的。我极希望某些安排可以实现。同时，必须看到现阶段当地同中国的联系已被隔断。在条件尚未容许更多的自由前，在进修教育方面能够和需要做些什么实实在在的工作一事最好还是先放一放。”⁽²⁵⁾在宋庆龄看来，由于战争等原因，香港与中国内地的联系已经中断，在这种情况下，

进修教育方面的作为不是很容易，因此建议英国援华会暂缓这一工作，而把精力用到华北地区的儿童救济上。为什么仅仅隔了两个月，宋庆龄的态度发生了这样的转变呢？这在1948年3月8日，宋庆龄致朱诺德信中可以找到一些线索，在信中，宋庆龄表示美国援华会已经减少了他们援助华北儿童工作的实际数额，写道：“另外一个援助来自英国援华会，克里普斯女士是该会的主席。可是该组织明年将改变它的政策了，他们不再送基金给中国了，他们实行奖学金和交换工作以代替援助”。⁽²⁶⁾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北方儿童工作由于缺乏资金处于危险的境地，因此宋庆龄写信给米勒夫人希望获得想要的援助。

2. 宋庆龄认为英国援华会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

虽然克里普斯夫人和米勒夫人在1946年曾访问中国，但是由于内战的发展，使得更多人无家可归，儿童的处境更加悲惨。宋庆龄在信中写道：“自从你上次离开后，这里的情况变得更为恶劣了。”⁽²⁷⁾在这样情况下，宋庆龄认为中国迫切的需求是医疗设备、药品和书刊。宋庆龄尤其希望英国援华会能像美国援华会那样，能够开展实物捐赠，这样对解决目前困难的局面有所帮助。

对于米勒夫人所质疑的英国援华会曾援助的晋冀鲁豫边区的太行托儿所工作人员过多的问题，宋庆龄非常急切地做了详细解释。“多数情况是地区托儿所与当地公共卫生机构结合在一起。因此工作人员的部分工作要走出机关进行妇幼卫生教育。这一任务对机关内部的工作计划是重要的，对托儿所工作人员进行家庭访问的农民也是重要的。”⁽²⁸⁾一人多职的工作状态使得所需人手的增多，而非存在人员浪费的情况，这是现

实的无奈的现象。另外宋庆龄提到“解放区大多数托儿所是部分自给自足的，这就是他们自己耕种小块土地和制作自己的衣服和毛毯。”⁽²⁹⁾宋庆龄希望通过这点说明托儿所所需的援助并非消耗在工作人员上，而是重点在学生的饮食上，因为“这里的学生除了少数例外，都是低营养的。营养不良和肺结核等疾病的发病率很高。由于他们主食是大米、极少量的蔬菜，实质上没有肉类，他们接受补助可以增加一点力气。”⁽³⁰⁾通过种种叙述，宋庆龄既表明了当前困难的状况，也要求了援助，是非常聪明的做法。

3. 宋庆龄认为销售和发行中国福利基金会报告是目前促进救济的好方法，但并未得到积极回应。

1948年4月16日，宋庆龄致伊丽莎白·米勒信中未提任何需要援助的话，只是集中对《密勒氏评论报》所发表的一篇文章提了一些建议。这篇文章着重介绍了宋庆龄，但并未对中国福利基金会进行更充分的报道，提到的部分也只是基金会在解放区的



中国福利基金会报告

那一部分工作，在宋庆龄看来有失公允。在宋庆龄所宣传的救济理念中，一直强调中国福利基金会是一视同仁的，因此对国外媒体所做的报道，宋庆龄十分在意。所以在这一年，宋庆龄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发行中国福利基金会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由蓝登出版公司的编辑弗兰克·泰勒先生亲手制版，文字由爱泼斯坦主编，全面展示了中国福利基金会在中国各地的整个工作计划，说明了基金会工作中的不歧视是如何贯彻执行的。宋庆龄希望英国援华会在募捐活动中可以“推销”一下这本小册子，将“中国福利基金会所进行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援助已推而广之，遍及整个国家。”⁽³¹⁾“这对英国援华会和中国福利基金会都是一次意义重大的宣传。”⁽³²⁾在宋庆龄致美国援华会领导卡特夫人和新西兰对外救济团体领导人莫里E时，都就推广这份小册子谈了自己的看法。宋庆龄希望通过借这份刊物的推广扩大中国福利会的影响，吸引国外更多的援助。很遗憾，以目前掌握的材料分析，英国援华会并未对此做出积极回应。但宋庆龄为之付出的努力的确是有目共睹的。

四、英国援华会的意义

英国援华会是中英两国同时经受他国侵略的情况下出现的，在当时困难的情况下，这种结盟带有很强烈的彼此安慰的意愿。这一有意的作为英国人民同情中国的象征而建立的机构更多的是一种姿态，一种立场。在克里普斯夫人和米勒夫人的感召下，英国国内的市政人员，工人，学生等等，都捐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援华会筹集了将近300万英镑的物资，包括资金、医疗器械，药品和衣物等。除了资金援助，更为可贵的是克

里普斯夫人援华会所做的文化工作。通过组织中国艺术品的展览，中国问题的宣传，音乐会，联欢会，对英国人民了解中国做了不可估量的贡献，该会在伦敦还出版了季刊，名为《明日之中国》，为我国的国际宣传出了不少力。

但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是，英国援华会产生的背景是在二战期间，中国遭受日本侵略的情况下，其募款原是为了救济中国反侵略，因战时而成立的。但是在战争结束后，面对这样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要想实现公允的救济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克里普斯夫人此次来华的意义并非将救济永久化，而是调查被惠及的团体的情况，从而探索将救济工作转化为文化工作的可能性。作为政府组织的中英文化协会虽说作了不少工作，但是仍然急需一个民间的文化联络团体。因此在1947年，英国议会，政府部门和教育部，决定成立一个私人组织——中英友好协会。协会理事的第一次会议在伦敦唐宁街11号的财政大臣家举行，克里普斯夫人成为第一任主席，米勒夫人成为荣誉秘书长。刚开始，这个协会只是帮助那些在英国因经济困难而无法完成学业的中国学生，资助他们在回国之前完成学业，因此可用的资金非常有限。通过查尔斯·富兰克兰·摩尔市长（Mayor Charles Frankland Moore）的英明管理，中英友好协会发展起来。协会的活动进一步扩大，可以为一些尖端的科研项目提供奖学金，资助中国的研究生继续在英国深造。米勒夫人强调，这一组织不仅要帮助那些在英国进修的香港、斐济、马来群岛的学者回国报效，还努力促成国际间的谅解。中英文化协会成立后，克里普斯夫人和米勒夫人的工作重点逐渐转向文化教育领域，英国援华会

的工作也渐渐式微，最终淡出历史舞台。

据不完全统计，英国援华会援助中国的物资有些用于教育项目，资助了中国14所大学的建设；有些以医药物资和医学科技书籍的形式供应给非政府经营的医院如国际和平医院等；有些用于中国工业合作社与山丹培黎学校的建设；有些用于儿童福利工作。这些援助是当时中国非常亟需的，因此尽管英国援华会后期的援助有其片面性，其积极作用仍不言而喻。

注释：

(1) 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1889-1952）：英国政治家。出生于伦敦富裕家庭，自小接受贵族教育。1930年加入工党。第二年，克里普斯被选为第二届工党政府的副司法部长、这个职位通常伴有爵士头衔，人称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1940年，丘吉尔当政期间，派遣克里普斯出任苏联大使。1942年，克里普斯返回英国，被任命为战时内阁的成员。1945年工党赢得大选后，任命他为经济部部长。1947年11月至1950年10月任英国财政大臣。他支持马克思关于国家控制生产和分配的经济观点。战后，为摆脱危机，他被迫增加税收，减少消费，以促进出口和稳定英镑。他在煤炭钢铁领域强有力地推行国有化策略，对推动英国经济的复苏起了重要作用。由于长期的肠炎、过大的压力，1950年，克里普斯因健康状况恶化辞职。1952年，克里普斯在瑞士去世。

(2) 何明华主教（1895年-1975年）：香港圣公会的前任主教。1932年至1951年任中华圣公会港粤教区（后称华南教区）会督，1951年至1967年任圣公会港澳教区会督。

(3) 笔者查阅的资料有《民国日报》、《中央

日报》、《大公报》、《申报》、《新华日报》等，报道如有出入，以日期在后的报纸报道为准。

(4) 《宋庆龄书信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第428页

(5) 《美龄号今飞香港 载刘锴李迪俊等出国迎克里普斯夫人来京》，《中央日报》，1946年10月7日

(6) 《克里普斯夫人在京酬酢忙》，《民国日报》，1946年10月12日

(7) 《克里普斯夫人与共产党代表交换意见》，《自由论坛报》，1946年10月13日

(8) 大绶景星勋章：中华民国总统府所颁授，属文职勋章，依《勋章条例》授予对国家政务有功劳的公务员或对国家有重要贡献的本国及外国人士。1941年2月12日颁行，分一等至九等。一等景星勋章由中华民国总统亲授，其余则由主管长官授予。所谓景星，犹言德星，指其德性崇高，典故出自《史记·天官书》，所谓：“天精而见景星，其状无常，常出现于有道之国”之意。

(9) 《主席以景星勋章赠克里普斯夫人》，《民国日报》，1946年10月13日

(10) 《克里普斯夫人出席英援华会常会》，《民国日报》，1946年10月14日

(11) 《克里普斯夫人谈话 援华会将继续工作》，《大公报》，1946年10月12日

(12) 《克里普斯夫人由并飞延安》，《民国日报》，1946年10月29日

(13) 《克里普斯夫人昨在穗参观》，《中央日报》，1946年11月25日

(14) 《加强中英人民友谊 克里普斯夫人访问延安》，《新华日报》，1946年11月3日

(15) 《宋庆龄书信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第446-447页

(16) 《克里普斯夫人昨由平飞抵沪》，《民国日报》，1946年11月15日

(17) 《克里普斯夫人昨招待中外记者 报告英援华工作》，《民国日报》，1946年11月16日

(18) 《克里普斯夫人抵沪》，《申报》，1946年11月15日

(19) 《克夫人今日来沪》，《申报》，1946年11月14日

(20) 《欢迎克里普斯夫人》，《自由论坛报》，1946年11月24日

(21) 《克夫人明进京辞行》，《民国日报》，1946年11月19日

(22) 《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9月出版，第728页

(23) 《宋庆龄书信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第544页

(24) 《宋庆龄书信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第607页

(25) 《宋庆龄书信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第645页

(26) 《宋庆龄书信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第641页

(27) 《宋庆龄书信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第607页

(28) 《宋庆龄书信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第645页

(29) 《宋庆龄书信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第645页

(30) 《宋庆龄书信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第646页

(31) 《宋庆龄书信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第609页

(32) 《宋庆龄书信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第644页

心中装着国家，心里想着人民 ——记宋庆龄和她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

撰文/夏义坤

2009年，是上海解放60周年和建国60周年。当我们在庆祝和纪念这一喜庆日子的时候，追忆当年宋庆龄在抗战胜利后关爱受灾民众，心系国家前途，反对国民党内战，支援解放区军民的件件往事，令生活在今天幸福生活中的我们肃然起敬。她那心中始终装着国家，想着人民的崇高品格和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让我们深深地怀念和崇敬。

求援救助， 帮助中国人民度过战后困难时期

1945年8月，中国抗日战争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这是中华民族在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反对外敌入侵的完全胜利，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要转折。

当人们在欢庆胜利的时候，宋庆龄所思所虑却是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是人民大众面临的战争创伤和生活疾苦。她在1945年12月发表的《保卫中国同盟声明》中指出：“战争以法西斯失败告终，并且带来了和平。似乎人民现在能安定下来，享受劳动的果实了。可是，在中国就不能这样”。宋庆龄说：“中国所遭受的创伤，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治愈。”“中国的工业，在沿海地区的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在贫困内地的也已奄奄一

息，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中国人民，尤其是住在华北和以前敌占区的，他们的力量大大地削弱了，经常为发生的灾荒和瘟疫困扰着，看不到在近期的希望，只能生活在失望和赤贫中。”

为了医治战争创伤，拯救贫苦大众，她全力以赴，再次投入到募集救援物资，救助贫苦民众的工作之中。

首先，她将“保卫中国同盟”改称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因为抗日战争的结束，支援中国抗战的“保卫中国同盟”的使命已经完成，为了更好地开展社会救济和援助工作，她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将“保卫中国同盟”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1946年1月14日，中国福利基金会在上海正式成立。之后，又根据任务需要，在中国福利基金会中先后设立了医药委员会、医药顾问委员会、国际和平医院采购委员会、促进委员会、中国灾荒救济基金会、文化工作者福利基金会、儿童福利委员会等众多的机构，调整和充实机构人员，把医药物资的采购、救济资金的筹措，以及援助物资的储运、分配等列为这些机构的工作范围。

其次，她全力呼吁国际社会给予中国人民以援助。她在《保卫中国同盟声明》中指出：“抗日战争的胜利，为我们带来了

许多新的问题和任务。要解决和完成它们，需要我们更多的努力。”她在中国福利基金会成立大会上呼吁外国朋友们给中国人民以更多的帮助。她说：中国现万分需要精神、物质和技术的支援，以度过战后这一段困苦的期间。”她指出：“国际上各救济机关虽则曾作过种种可敬和最大的努力，但还是不够。”“中国所受到的创伤，还要一段长的时间才能痊愈，……还需要外国友人进一步的援助。”从1946年初开始，她利用各种关系，通过各种渠道向世界上诸多国家的慈善部门、救援机构、红十字会，以及友人写信，感谢他们曾对中国人民的帮助和支持，阐明中国福利基金会救济工作的计划和重点，商讨下一步救援工作和救援物资的购置、运输事宜，呼吁国际社会给予中国人民更多的援助。在当时经济落后，交通不便的情况下，这种争取外援，运送物资的工作非常艰难和复杂，需要有无比才能和智慧。她在给王安娜的信中说：“我分分秒秒的时间都被占用了，连写封短信叫厨师送给你的时间都没有。”反映了她当时工作之艰辛，时间之紧张。她运筹帷幄，亲力亲为，把全部的精力和智慧都投入到了战后救援工作中。

第三，她全力开展支援灾区和救济难民工作。中国福利基金会在宋庆龄的领导下，把救济灾区难民工作作为机构的主要任务，重点是救济受灾最严重的解放区。当时，中国福利基金会是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主要救援物资供应者，实际成为了解放区救济总会救援工作的具体执行机构，为解放区筹措了大量的救援物资，其中有钱款、医药、服装、食品。1947年，经宋庆龄同意，中国福利基金会还成立了总部设在美国的战灾儿童



义养会中国分会，直接从美国义养会获得定期资助，使得全国30多所学校、团体约5000名儿童受益。

此外，中国福利基金会在积极援助解放区军民的同时，把援助国民党统治区的受灾贫民也作为援助工作的一部分。1946年，中国福利基金会建立了中国灾荒救济基金会，先后拨出基金帮助湖南邵阳、广东、福建等地4个生产合作社和邵阳地区的4个孤儿院。

在上海，中国福利基金会也是积极开展救援工作，先后举办《孟姜女》音乐会、《祥林嫂》义演等各种募捐活动，所得款项全部用作救助贫苦儿童，赈济灾民，援助贫病作家、艺术家。在上海贫困儿童集中的沪西地区，中国福利基金会建立了第一所儿童福利站，组织失学儿童学习文化，为患病的贫困儿童和家长提供医疗服务，向困难家庭发放救济物资和衣服。到1949年初，中国福利基金会与上海地下组织领导的救济会，在上海的棚户区，开设了14所儿童福利站，并向贫困儿童发放了大量的大米、奶粉等食品。所有这些工作，为帮助灾区民众、苦难儿童、贫病作家、艺术家渡过战后的困难时期，提供了有力的帮助，赢得了国内外社会人士的广泛支持。

发表声明，呼吁组织联合政府

抗战胜利后，正当遭受多年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终于有机会医治伤口，享受和平的时候，一场新的危机正在悄然袭来。这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大政治派别之间是战争是和平的问题。摆在中国人民面前有两个前途、两种命运。一种是继续法西斯独裁统治，将中国拖回到痛苦不堪的无自由、无民主，以及全面内战中去；一种就是团结全国人民，废止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建立联合的、民主的政府，实行民主改革，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中国共产党为了寻求和平、民主、团结的道路，揭露美蒋反动派“假和谈”的阴谋，向全国人民表明和平诚意，派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了为期43天的和平谈判，最后在双方作出让步的情况下，签订了《国共双方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对国共和谈，宋庆龄同全国人民一样，既抱着很大的希望，也对国民党的诚意表示担心。回到阔别八年之久的上海之后，宋庆龄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福利基金会的组织工作和援助解放区、救济灾区人民的工作中。然而，1946年6月，蒋介石自恃有四百多万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军队，控制着全国几乎所有大城市和交通干线，有美国政府的支持，撕毁停战协定，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一场全面内战。

在蒋介石的嘴脸彻底暴露，和平谈判已经中止的情况下，宋庆龄发表了《对时局的主张——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

的声明》，揭露美国政府和蒋介石的反共阴谋，提出成立联合政府，制止内战；要求美国撤走军队，停止援助蒋介石。她在声明中指出：“今天的国土已经没有外来敌人的威胁。但威胁却起自国内，起自内战。”

“国民党必须正确理解与应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应当立即组织联合政府”，“否则就要担负掀起内战的责任”。她指出：

“国民党必须通过联合政府、人民民主和土地改革来执行它的历史任务，领导中国人民走向全国解放。”她说：“内战不能促成团结和解放，不解决民生问题。内战带给中国人民的只是混乱、饥饿和破坏。”

宋庆龄的声明，得到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一致拥护。在国外，美国共产党发表宣言，要求美国政府撤回一切在中国领土上的美国军队；美国各大媒体也纷纷发表文章，高度评价宋庆龄的声明；罗斯福总统夫人也发表谈话，要求美国政府放弃对中国的军事干涉。在国内，一些著名人士和进步团体也纷纷发表通电、声明或公开信，拥护宋庆龄的立场，要求把中国从内战、分裂、混乱、恐怖和穷困中拯救出来，建立民主统一的新中国。全国上下，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美国政府不得干涉中国内政的呼声日益高涨，反内战、反分裂、反恐怖、要民主的运动此起彼伏。在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下，美国政府不得不在1946年8月开始，停止批准向中国出口作战用的军事装备许可证。9月29日，美国政府又发布一项指令，暂停交付计划中的一切军用物资。宋庆龄的声明使国内外人民了解了中国内战的真相，推动了全国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得到了世界正义人士的支持，有力地支援了解放区军民反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

募集物资，支援人民解放战争

抗战胜利后，上海已在国民党的完全控制之下，独裁统治，白色恐怖，敌特横行。而宋庆龄因援助的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受到了敌特的监视、反动势力的恐吓与威胁、污蔑和利诱，她承载着压力、担负着风险，凭借“国母”的特殊身份和地位，始终坚持在救济解放区军民重要后勤物资供给的最前线。根据中国福利会志记载：“从1946年至1948年，是保卫中国同盟成立以来给国际和平医院和解放区儿童保育机构医疗、救济物资最多的一个时期”。“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重点，始终是援助国际和平医院、医学院、制药厂、保育院、托儿所、农场等解放区各项事业。在解放战争过程中，这些被资助的事业迅速发展。到民国37年（1948年），原来的4所国际和平医院发展为8所，还有42所分院，拥有11800张床位和20个流动医疗站的医院网络，分布在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苏皖、山东、晋绥、冀热辽和中原等解放区，为1.4亿人口的解放区军民服务”。

正如当时曾任中央军委卫生部第一副部长的沈其震同志回忆所说，宋庆龄和中国福利基金会“秘密地为解放区筹集药品和物资，其数量之大，一时难以统计清楚。只记得，仅华东军区一次转移中，就用了500名民工搬运了一天多”。

1946年夏，宋庆龄用国外捐款，在菲律宾马尼拉向美军剩余物资处理机构，购买了一包含250张床位的医院全套设备（共1217箱、重430吨），运抵上海后，装了大约100多条船只，通过与“联总”和“行总”的

多方交涉，分批从上海经镇江、扬州，沿运河线运送到苏北解放区的淮安城湖心寺。沿途同样遭到国民党军队的重重阻挠，但最后终于运到目的地，创建了苏北第四国际和平医院。这些援助似雪中送炭，鼓舞了前线指战员，有力地支了解放区军民打击和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

内战全面爆发后，国民党对军需物资的运输进行了严密封锁，当时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救济工作更加困难重重，宋庆龄一面通过国际友人，以国际红十字会的名义，冲破重重封锁和阻扰，将大批医药物资直接运抵解放区，一面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渠道将援助物资秘密运往解放区。

有一次，一批运往解放区的物品在黄浦江码头受到国民党的刁难，宋庆龄得知后，马上赶到轮船码头，对趾高气扬的国民党兵说：“这些东西是我的，立即运往对岸。不行吗？”货船才得以顺利启航。

宋庆龄以非凡的智慧、坚定的献身精神，领导中国福利基金会全力支援解放区，为夺取中国人民革命的最后胜利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今天，在我们欢庆上海解放60周年和建国60周年的时候，不能忘记宋庆龄以及她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所做出过的杰出贡献。

参考文献：

- (1)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人民出版社，2004年3月版
- (2) 盛永华主编：《宋庆龄年谱》，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版
- (3) 杜淑贞主编：《中国福利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4月版

听“小先生”讲那过去的故事

撰文/蒋慈华

近日笔者有幸接待了张盛祥、王作新两位老人，他们曾是宋庆龄在解放前创办的第一儿童福利站的“小先生”。如今当年的“小先生”都已是年逾古稀、两鬓斑白的老先生了，然而回忆起往事，他们思路清晰、神情激昂，仿佛回到了那段峥嵘岁月，又看到了那个忙碌而又美丽的身影。

上海的第一个儿童福利站成立于1947年4月4日，地点设在胶州路725号的晋元小学内，是由1946年10月建立的儿童图书阅览室扩建而成的。福利站面积不大，有两间圆顶的铁皮活动房。这些活动房原是二战时期美军的剩余物资，后来赠给了一些救济团体。儿童福利站开办有阅览室和图书馆。开始时只有少量图书供少年儿童阅览，后来大批图书充实后就可以免费外借了。书籍的内容广

泛，既有通俗易懂的连环画、故事书，也有政治性强的进步书刊，如《新少年报》《开明少年》《钢铁是怎么炼成的》等等。当时很多家庭能够勉强维持生计已经很不容易，根本买不起这些“闲书”，所以小小的阅览室和图书馆里常常挤得满满的。福利站里还设有保健室，免费为贫苦儿童进行简易的治疗、到贫民区宣传卫生知识、打预防针，有时还发放奶粉等一些救济物资。

福利站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位工作人员，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他们把经常来福利站看书，年纪较大、素质较好的学生组织起来，经过培训，让他们担任图书馆阅览室的服务员和保健站的义务保健员，帮助做一些如值班、宣传等力所能及的事情。福利站的老师还根据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即知即传”的教育思想，按照宋庆龄提出的工作要求，开展了“小先生”活动。这些学生每天放学后就来福利站义务教书，教失学儿童识字、唱歌、做算术，给他们讲故事。在寒暑假，还把小先生活动分散到里弄中去，办家庭识字班。那些贫苦儿童衣服破旧、生活困难，但他们学习认真，很少缺课，因为有书可读对他们来说是多么不容易啊。

福利站的老师极为重视对小先生的教育，为他们推荐进步书籍、定期组织读书会，交流读书心得，每周还抽时间学习扭秧歌、排练话剧。毛振珉老师（中共地下



1947年，宋庆龄和中国福利基金会执行委员会比尔·鲍威尔在第一儿童福利站工地。

党员，解放后曾任共青团上海市委少年部部长、人民出版社党组书记、副社长）在给“小先生”队长张盛祥的一封信中写到“别把我看作老师，把我看作朋友，一个够朋友的朋友，这样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坦白地说我们要说的话。”福利站里充满着友爱、民主、团结的气氛。

1947年10月、11月上海的第二、第三儿童福利站也相继在沪东许昌路811号的通北公园和虹口区乍浦路245号昆山公园内建成。关于当时的情况，鲍威尔夫人西尔维亚·坎贝尔在一封家信中写到“我多么希望你能看到我们在这里做的工作。很难描述我们办的这些家庭识字班、小先生、接受免费治疗的队伍、难民营。我们的群众性识字班已经吸收了2500名儿童，成为全市一所最大的小学。我们在1948年为43000人提供了免费医疗。”

宋庆龄十分关怀儿童福利站工作的开展，她不但经常到福利站看望老师和孩子们，更是把心力放在物资的筹集上。儿童福利站的需求是大量的，包括保健站所需的各类医药用品，图书馆、阅览室和识字班所需的图书、纸张、铅笔、粉笔、黑板等学习用品。宋庆龄通过写公开信、编印宣传册、安排参观福利站等方式向海外的援华团体和友人介绍儿童福利站的工作情况和需求。宋庆龄还领导中国福利基金会先后组织了三毛乐园会和三次儿童福利舞会来募集资金。1948年3月宋庆龄致函联合国国际儿童紧急基金会中国部主任朱诺德“我们上海儿童工作是通过中国福利基金会三个儿童福利站来开展的……这三个站位于上海最贫困的地区。”

“这些工作所需的基金和物资，你从预算中可看到，虽然他们做着大量看得到的工作，

他们仅限于我们能够筹得的款项，甚至在这方面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仍不能满足很明显的需要，所以我们向联合国国际儿童紧急基金会申请援助。”收到捐赠，宋庆龄每次都要亲自给捐赠者回信，对他们表示感谢，并附上收据，不论这笔捐赠是几本书或是几美元。

在宋庆龄的关怀下，儿童福利站的工作蓬勃开展。“小先生”制度，群众性识字班在贫苦儿童初级教育中取得了惊人的成效，为民众教育提供了宝贵经验。建国后的群众性扫盲运动就是采用这一做法，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在铁皮活动房中开始的事业后来发展成新中国最大的少年宫、规模最大的妇幼保健院和全国著名的儿童艺术剧院。在这些“小先生”和在铁皮活动房中开始识字的孩子中间，很多人成长为新中国建设的栋梁。就像宋庆龄所说的那样“我们正在提供一种方法，可以训练出许多未来的领导人。——那些人将关注并愿意为实现提高全国同胞的生活水平而努力。这是最实际的自助助人的方法。给他们工具，让他们锻造中国光明的未来。”

参考文献：

- (1)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人民出版社，2004年3月版
- (2) 盛永华主编：《宋庆龄年谱》，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版
- (3) 张盛祥主编：《难忘激情少年时——回忆上海第一儿童福利站》，内部刊物

纪念馆与社区文明

撰文/倪青燕

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以下简称宋故居）是座落在天平社区内的一家非经营性文博单位，因为宋庆龄的声名与威望，一直受到众人关注。宋故居已连续多届获得市级文明单位的称号，在文明单位的创建过程中，宋故居意识到只有将自身的创建融入文明社区的创建中，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取得更大的效应。

与天平社区内的其它单位相比，宋故居的不同之处在于：首先它是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的一个单位，因而在文明社区的建设中，应该以开放式的姿态，张开双臂迎接和投入到文明社区的建设中去；其次它是一个文博单位，文博单位与文明建设的关系应该是如胶似漆，难以割舍，换言之，也就是在文明社区的建设中义不容辞；第三它是一个教育基地，除自身接受教育以外，更负有宣传、弘扬宋庆龄的伟大思想、精神、品格的光荣职责，而宋庆龄的形象本身就是精神文明的典型，对推动文明社区建设具有引领作用。

宋故居肩负着保护、研究宋庆龄遗留下来的珍贵文物和接待中外来宾及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使命，接待服务成为宋故居的主要工作之一。长期以来宋故居坚持从三方面着手：在接待服务中体现“五心”，即热心、细心、耐心、诚心、虚心地对每一位观众。对来馆参观者，不论是购票的还是免票的，都一视同仁，提供同样优质的服务；不断改进讲解方式，完善讲解内容，坚持为观众提供交流式的陪同讲解，力求讲解人性

化、个性化，更具亲和力，逐渐形成讲解品牌；对行动不便的特殊观众热情关怀，提供细微、特殊的服务，常备地图、针线包、药箱、雨伞等方便各方观众。

在坚持创建文明单位的同时，积极融入文明社区的建设之中。既能提升本单位的文明程度，又能为文明社区的建设推波助澜，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局面。鉴于宋故居的性质特点，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推动天平文明社区的建设：

其一、组织天平社区内的居民参观宋故居。宋庆龄曾经是天平社区的居民，在此居住时间长达三十多年，天平社区是她上海居住时间最长的一个区域，可见她与天平的渊源关系。天平社区的居民参观故居，会比其他人参观更多一份亲近感。组织辖区内的居民开展“走进宋庆龄的家”活动，伫立在宋庆龄生前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置身于当年宋庆龄从事国务活动的场景中，仍可感受到宋庆龄的音容笑貌和不朽风范。可举办的拓展活动有：遇宋庆龄诞辰、忌日时，开展“以鲜花代门票”活动，缅怀、追思伟人业绩；配合社区单位党团活动，在宋庆龄雕像前举行入党、入团、入队、十八岁成人等仪式，用伟人精神激励自己；在“三八”妇女节、“六一”儿童节、“七一”党的生日、抗战胜利纪念日等，开展专题活动，瞻仰宋故居，学习、研讨宋庆龄的思想和品格，弘扬伟人精神；寒、暑假期间，组织冬令营、夏令营，让中小学生在假期内接受伟人思想

和精神的熏陶。

其二、到天平社区内的各居委会、学校、部队或企事业单位进行宣讲。宣讲可以结合社会庆典活动确立主题，如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时，可以着重宣传宋庆龄与中国抗日战争的事迹，从中领略她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庆祝“七一”党的生日时，可以着力介绍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宋庆龄一生追随共产党，矢志不渝，直到弥留之际了却心愿。

——到居民中去，可以着重介绍宋庆龄与保姆李燕娥之间的姐妹之情，从这段传世佳话中折射出宋庆龄高尚的道德品质；

——到学校去，集中宣传宋庆龄关心少年儿童的一片慈爱之心；

——到部队去，重点宣传宋庆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不朽业绩，激励官兵斗志；

——到企事业单位去，广泛宣传宋庆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积极贡献，弘扬她无私的奉献精神。

总之，将体现在宋庆龄身上的真、善、美集中昭示出来，将宋庆龄的高尚品格弘扬于世，让后人从中照见自己，鞭策自己。宣讲形式主要采用多媒体，文字资料和图片并举；举办小型展览，图示和宣讲相结合；播放碟片，从音像资料中增加对宋庆龄的直观了解，让栩栩如生的宋庆龄的形象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其三、开展多种形式的共建活动。天平社区内有着丰富的社会资源，尤以政治、人文资源居多，开发利用这些资源，对文明单位和文明社区的建设具有推动作用，为此，宋故居一直积极参与其中。其主要活动有：

1. 与所在居委会开展共建活动。一起上党课，聆听社区老党员、老干部的革命传统

报告；一起参加文明交通岗值勤，在值勤中提高交通法规意识；为康平居委会开设英语会话课，满足居民学英语的求知欲望。

2. 在周边学校开展“宋庆龄班”创建活动，由宋故居的讲解员担任“宋庆龄班”的辅导员，让宋庆龄的伟大精神在青年学生中代代相传；开展志愿者培训活动，让每年接受培训的数十名志愿者在服务观众中，践行宋庆龄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奉献精神。

3. 参加天平社区“东方讲坛”讲座，聆听专家、学者的报告，丰富职工的社会知识；参加天平社区的帮困助学活动，让宋庆龄对少年儿童的关爱在宋故居得以延续；以朗诵、演讲、小品等形式积极参与社区的文化艺术活动，在宣传宋庆龄的同时陶冶自己的情操。

4. 作为社会教学点，为社区内的学校、企事业单位提供教学平台，开展专题教育，如宋庆龄与少年儿童、宋庆龄与妇女工作、宋庆龄的优秀品格等等，这种教育开发的不是人的智力，而是施以真、善、美的熏陶。

5. 围绕宋庆龄其人其事，召开小型主题座谈会或主题班会，由与会者自由广泛地提出问题，由讲解员进行针对性的解答，近距离地互动交流，可以变被动听讲为主动思考，活跃氛围，便于吸收相关知识。

6. 开展系列活动，如将孙中山故居、宋庆龄故居、宋庆龄陵园整合在一起，组织一日游或主题参观活动，让观众在对伟人的瞻仰中净化心灵，升华思想境界。

文明单位与文明社区的建设能够做到水乳交融，对双方创建工作的促进将是显而易见的，有事半功倍之效。为此宋故居与天平社区在不断的创建过程中将互相依托，携手走向文明的新征程。

对本馆后勤保障工作的几点认识

撰文/王家野

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对公众开放二十多年来，在发挥社会宣传教育功能和馆藏文物保护研究工作等方面不断取得新的进展，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其中完备的行政后勤保障管理工作为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笔者参与这项工作两年有余，对本馆的日常后勤保障服务管理的认识随着工作的不断深入而逐步提高，以下简要地谈谈自己的认识。

一、后勤管理的位置

我馆各项工作的运转都离不开后勤保障管理工作，尤其是对馆藏文物的保护、研究和社会公众的宣传教育等工作能正常开展，都是在后勤服务有了比较充分的准备的基础上进行的。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草即后勤保障管理，它的任何保障服务都始于其它工作前，并始终贯穿于其它工作的每一个环节，是以维护保证各部门工作正常运转为目标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我馆建设发展的基础保证。

随着2006年对故居主体建筑的修缮加固和2008年对文物馆陈列的改版，各种服务类和办公类设施设备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如为丰富宣传内容和满足观众需求，分别在纪念广场新设了滚动播出的大屏幕、在文物馆内增加了可供浏览的触摸屏等多媒体设备；为



改版后文物馆中所用的多媒体设备

更好地保护陈列文物，在故居主楼内置放了可随时调整温湿度的设备；为提高工作效率，给每位员工配备了电脑及网络硬件设施等；此外，庭院绿化建设和参观环境的美化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等等。这些对日常的管理工作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服务保障工作如果不到位、服务质量的好坏和管理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影响本馆的对外窗口形象、影响本馆的工作质量和水平，馆领导非常重视这项举足轻重的管理工作，组建了行政保卫科，集中力量全面承担起日常的后勤保障重任。

二、后勤管理的特点

1. 涵盖面广，管理项目多样。包括安全保卫等技防人防管理、古树名木等绿化养护管理、参观环境等清洁卫生管理、网络系统硬件管理、固定资产实物管理、办公用品的采购及多媒体等对外服务类设备设施的配备

和日常运行维护保养管理、公务车辆管理等，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2. 服务性强。后勤管理始终是要围绕馆的中心工作任务来开展，其工作内容是本馆各项工作展开的基础，如设施设备的配备和维护保养、各种办公用品的采购、房屋维修、庭院环境美化、古树名木等绿化养护等都围绕纪念馆对外正常开放进行，其特点决定了它的从属性，决定了必须以大局为重，以服务为先。

3. 协调性重。为顺应文博事业和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本馆开始尝试借助社会力量管理后勤事务，先后与保安公司、专业绿化养护公司、专业的保洁公司为本馆的正常运转签定了友好合作协议，尤为强调和谐的管理关系。此外，为有利于各项工作的顺利展开，馆内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支持也至关重要。营造一个和谐的工作环境、轻松愉快的氛围，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员工的潜能。

4. 时效性高。后勤管理是动态的，随机性强，需要管理执行者有很强的时间观念，能够合理地运筹时间，加强预见性。没有很好地统筹兼顾、把握规律的话，日常工作会处于忙碌无序状态。特别是一些保障性服务都有其即时性，如展厅照明灯坏了必须及时更换，售票系统或验票机出问题了必须立即修理，技防监控设备出故障了必须尽快排除等等。

三. 后勤管理的思路

1. 加强后勤管理制度的建设，促使后勤服务规范、有序、科学。

制度的功能在于规范和约束行为，要将工作做细做好，必须有切实可行的制度或措施作保障，紧紧地依靠制度有利于后勤事务

管理，使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正在我馆推行的ISO9001质量贯标体系，指导我们建立和健全了后勤管理的规章制度，在原来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部门职责、岗位职责、工作规程等，如规范设施设备使用的管理程序、执行办公用品申请采购的规定等，这些都能够提高管理的有效性，促使管理科学化、程序化、规范化。随着发展和变化，及时完善制度，使之“以人为本”，具有可行性。

在日常工作中，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为共同维护管理制度的公正性和严肃性，还需各部门进一步强化制度管理的意识，加大自觉执行制度的力度。

2. 重视后勤管理队伍的建设，提高管理人员的工作能力。

在后勤工作中应善于总结经验，注意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发现问题和不足，积累成功经验，以提升管理的能力和水平。另外我们还应注意到本馆的后勤日常工作不同于其他各业务部门的工作单一，需要知识密集性的管理人员，如样样能做好，事事能应付，要求管理者有较广泛的知识面和合理的知识结构，增强驾驭工作的能力，这就需要扩大学习范围，可以在书本上学、在实践中学、走出馆外学等，把学习当作工作的一部分。既要学习管理方面的知识，还要分门别类地学习相关业务知识，如为维护多媒体设备的稳定性，有必要学习多媒体技术知识，探索和总结其在展示应用中的基本规律和要求，以增长解决故障的本领；再如：学习古树名木的保护技术、学习文物鸽的喂养知识等等；此外，后勤工作也需要理论指导，应注重培养理论修养，努力提高思维能力，这是推动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克服那种后勤工

关于我馆扩大影响的浅见

撰文/丁灵敏

在故居工作三年多了，每天走在百年香樟笼罩的绿荫下，就在心里想着如何可以让故居吸引更多的观众，增加馆内的参观流量这个问题。近几年来，我馆的硬件设施有了很大的提高，主楼的大修，文物馆的改版，语音导览器的配备，得到了观众很好的反响。但是如何更好地扩大故居的影响，让故居成为淮海路上的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呢？作为一名纪念馆的工作人员，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在当今社会中，许多行业都是共通的，我从其他一些行业借鉴了一些做法，对本馆扩大影响提出自己的一些浅见：

第一，扩大宣传。一个纪念馆要增加参观的人数，提高业绩，靠得就是宣传！只有让观众知道有宋庆龄故居这个地方，大家才会来参观。我周围的许多朋友，因为不是在博物馆行业里工作，也疏于关心这方面的信息，所以对宋庆龄故居并不了解，如果不主动向他们推广关于宋庆龄故居的信息，他们作为观众这一对象便流失了。对于服务性行业，只有让更多的人知道淮海中路1843号是宋庆龄故居，才能增加参观流量、扩大影响。在对观众的调查统计中显示，有许多是路过淮海路而进来参观的，但如何让更多的

作主要是事务性服务，不需要学习，不需要理性思维的错误观念。

如要有效履行和不断强化后勤管理的职能、提高服务质量、适应不断的变化，墨守成规、按部就班是不行的，需要我们围绕馆的中心工作，在牢牢把握特点和规律的基础上，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地在实践中总结，在总结中创新，在创新中提高。避免因循守旧、不能突破原有的思维方式和习惯模式的状况，才能推动管理水平的提高和跟上纪念馆发展的步伐。

3. 强调部门之间的密切配合，促成后勤保障服务高效有力。

后勤管理工作是整个纪念馆工作的不可缺少的部分，与各个业务部门关系密不可

分，部门内的业务工作的顺利展开，都离不开后勤保障部门提供的服务。后勤管理工作虽常常是从一些琐碎小事做起，却牵动着大局，事无巨细，头绪繁多，需要领导的关心支持，也需要各业务部门的理解和协助。全馆各部门之间加强沟通交流，各业务部门及时把有关服务信息反馈，将有利于我们将服务保障工作做到位，更好地掌管好这个“家”。

后勤管理人员所承担的工作涉及管理、服务、保障等方方面面，在人手少、事务多、内容杂的情况下要主动工作，不仅要做到保障有力、服务到位，还要廉洁自律、乐于奉献和甘于寂寞，努力将本职工作扎扎实实地做好。

观众主动到宋庆龄故居参观，才是最好的方式。至于如何有效的宣传，其中最便捷的方式就是通过互联网。现在我们故居的网站做得还不够完善，无法支持英文、日文等多种语言，没有针对少儿观众的互动版块，这在以后的工作中值得深入和挖掘。

第二，临时展览。大家都去过麦当劳和肯德基，他们都是世界顶尖的成功企业，我想可以借鉴他们的推广方式。他们除了经营主要的汉堡之外，会定期推出一些新的汉堡，或推出一些新的组合，如肯德基德牛肉五方，麦当劳的双层板烧汉堡，都是以前没有的，这些行销手段不断吸引着新老顾客来品尝。我馆的基本陈列包括两大块，一是主楼的原状陈列，二是文物馆的宋庆龄生平陈列。观众第一次来这里参观后，如果没有新的看点，他们是不愿意第二次走进来的。值得庆贺的是，由于场地的调整，今年我们已经完成了两场临时展览，即《琼英留韵——宋庆龄与妇女解放》图片展和《清菊雅石——宋庆龄的高尚品格》图片展，吸引了妇女团体等大批观众前来观看。另外后者还是配合“追寻宋庆龄的美德”有奖征文竞赛推出的展览，是一种非常好的形式。但是这两次陈列还有些不足，即缺少文物的佐证。在以后的临时展览策划中，可以配合纪念日、5.18博物馆主题等，将图书出版、新发现的文物、讲座、捐赠仪式等一起推出，以此增强社会影响，也可提高我馆的学术水平。通过不断的变化，故居就能“活”起来，参观的人数自然源源不绝了。

第三，多举办出境展览和国内巡展。中国的旅游市场存在着很大的潜力，不仅仅是上海这个市场，更需要面向全国，面向世界。把全国各地的人们吸引过来，扩大影响

力。去年新浪举行了新浪企业服务(SME)产品全国巡展，这次活动自2008年9月起开始至12月底结束，覆盖了华东、华中、华南等主要省市地区，跨越上海、杭州、宁波、武汉、长沙等十余个大中城市，活动全程为期近四个月之久。很多歌星也会在世界各地举行巡回演唱会来扩大知名度。今年6月我馆在重庆三峡博物馆举行了“宋庆龄在上海”巡展。这次巡展展出了许多珍贵的文物，在当地掀起了一股参观的热潮。如果参观此次展览的观众以后有机会来到上海，将大大增加他们来我馆参观的机率，成为我馆的潜在观众。如果以后有机会组织出境展览，也是对宋庆龄和我馆极好的宣传。

第四，加强合作。要提高我馆的参观人流量，扩大社会影响，只靠馆内的工作人员也是不够的。一个人的成功，一个企业的成功都是靠团队协作，与外部紧密合作。和旅行社合作是非常好的方式，通过旅行社进行推广，把它们游客带到我们这里来。今年我馆组织人员到南京参加旅游博览会，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还可以同徐汇区旅游局合作，通过在徐汇区的各家酒店中发放宣传册，达到向外界宣传的目的。只有加强合作，才能更好的宣传，才能更好的发挥社会影响力。

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一环，未来的发展方向应是向社会提供更多的文化产品，进一步提高社会影响力。“影响力与社会服务”在评比中所占权重最大，正表明了时代对博物馆的要求。博物馆需要继续提高自己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才能吸引观众走进来，得到美和艺术的熏陶，才能成为群众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日本前首相 福田康夫接待手记

撰文/傅强

2009年2月27日，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①来到上海，出席2010年上海世博会日本国家馆开工仪式。2月28日，对中国文化、历史抱有极大兴趣的福田康夫先生来到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参观，作为故居宣教部的一位讲解员，我有幸参加这次接待工作。

上午十点左右，福田康夫先生在日本领事的陪同下准时来到了故居，在故居的纪念广场上，福田康夫先生面带微笑与前来迎接的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馆长陆柳莺和接待人员一一握手，在宋庆龄的雕像前稍作停留后，一行人步入了新改版的宋庆龄文物馆。

我首先向福田康夫先生介绍了宋庆龄的父母以及她的求学经历，当得知宋庆龄的父亲是孙中山的好友时，福田康夫先生点了点头。在介绍宋庆龄与孙中山的婚姻时，我有意放慢了节奏，因为这一段经历对宋庆龄有着特殊的意义。宋庆龄大学毕业后，于1913

年8月来到日本，不久接替姐姐担任了孙中山的英文秘书，1915年10月25日，孙中山与宋庆龄在东京结婚，之后两人又一起在日本生活了半年。如果说孙中山在北京逝世，让那里成为了宋庆龄的“伤心地”，那么两人相恋、结婚的日本则是宋庆龄充满了幸福回忆的地方，福田康夫先生一边听着介绍，一边饶有兴致的观看了用日文记录的孙中山宋庆龄结婚誓约书、宋庆龄精心保存的孙中山遗物和遗墨。

在介绍毛泽东和周恩来邀请宋庆龄北上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两封亲笔信时，我发现，福田康夫先生对毛泽东的字迹很感兴趣，在仔细观看后，他突然问到：“现在的中国年轻人还能写出这么好的毛笔字吗？”我想了想，回答说：“不是每个人都能写出这么好的字，但是有很多人从小学习书法，这种优秀的文化还是得到了传承的。”福田康夫先生点了点头。

讲解到宋庆龄从事外交活动的板块，我向福田康夫先生介绍了宋庆龄珍藏的各国国务礼品，既有亚洲各国的，也有非洲和美洲国家的。这时，福田康夫先生突然发问：“为什么没有日本的礼品呢？”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让我一瞬间有些愣住了，不过我很快想到主楼的客厅里摆放了一个来自日本友人的灵芝图案脱胎漆盘，于是我回答说：



“宋庆龄特别喜欢日本友人赠送的礼品，摆放在了自已的客厅里，所以没有出现在这个文物馆。”福田康夫先生微微一笑，看得出，我的这个回答让他很满意。

在文物馆的寓所生活单元，陈列有宋庆龄的宴客菜单和藏酒，在这里，我原本没有做重点介绍，可是没想到，福田康夫先生却很感兴趣，还让工作人员把菜单的内容翻译给他，后来我才知道，原来福田康夫先生不仅是一位政治家，还是一位出名的美食家，尤其在葡萄酒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

文物馆参观结束后，福田康夫先生在故居的会议室稍作休息，之后来到了宋庆龄曾经居住过的主楼参观。在这里，福田康夫先生再没有发问，而是很认真的听我讲解，表情也变得严肃起来，我知道，这是他对逝去伟人的尊重。在接待前，我就了解到，福田康夫先生一直致力于中日友好，而他个人对中国历史尤感兴趣，这次到上海，专程参观了鲁迅故居、孙中山故居和宋庆龄故居，不仅是缅怀先贤，也是对这些为中日友好做出贡献的先行者们的纪念。来到宋庆龄的卧室，我告诉福田康夫先生，宋庆龄在这里除了悬挂她与孙中山的结婚纪念照，还亲自布置了两幅日本民间版画，福田康夫先生在惊讶之余，不禁点头表示赞许。

主楼参观后，福田康夫先生一行来到花园内，以故居主楼为背景，他与陪同参观的陆柳莺馆长、日本领事一起合影留念。步出花园后，福田康夫先生的参观已接近尾声了，他再次与每一位接待人员握手，并向大家表示了谢意。临别时，陆柳莺馆长表示：

“欢迎福田康夫先生明年带更多的日本朋友来上海参加世博会，届时再来宋庆龄故居参观”。福田康夫先生点头回答：“一定会

的”。

目送着福田康夫先生离开故居，我想，这位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怀着美好感情的日本前首相，一定会实现他的承诺，福田康夫先生，我们2010年再见！

注释：

(1)福田康夫：1936年7月16日生于群馬县高崎市。1959年3月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毕业后入石油会社。1977年12月至1978年12月任内阁总理大臣秘书官。1979年任其父福田赳夫的私人秘书。1990年首次当选众议员。1995年8月至1996年1月任外务省政务次官。1996年10月任自由民主党外交部会长。1997年1月8日，应中国外交学会的邀请对中国进行访问。2000年7月任自由民主党政务调查会副会长。2000年10月任国务大臣、内阁官房长官。2001年4月、2003年9月连任内阁官房长官。2003年8月来北京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5周年纪念活动。日本执政党自民党2007年9月23日下午召开两院议员大会，该党所属国会议员和各地方支部代表进行了新总裁选举。最终前官房长官福田康夫(71岁)击败党干事长麻生太郎(67岁)，当选为第22任自民党总裁。福田共获得330票，麻生为197票。福田于2007年9月25日召开的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当选为第91任首相，并于当天组建新内阁。福田康夫主张政治改革从每一个政治家自身做起，在政策方面以稳健著称。他性格温和，但直言不讳。福田康夫是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的长子，因此日本首次诞生了父子两代首相。2008年9月1日，福田康夫在首相官邸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辞职。

参加旅游博览会后的思考

撰文/吴颖嫣

2009第十三届长三角南京旅游博览会于3月22日在南京落下帷幕，本次旅博会汇聚了国内外200余家参展商参展，在展览现场除了设置了国际展区、台湾展区、七大古都专区、南京都市圈展区、上海展区等常规展区外，还设置了南京10家旅行社优惠线路产品促销专区、主题表演专区等几个专题展区。在展览区域，展商的数量、展区的分布和规模都达到了历届之最，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而，在整个参展过程中，很多现象却引起了笔者自身对旅游博览会的一些思考，正如同一首词中所说的那样——“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思考之一：

旅游博览会的举办目的究竟是什么？

从名称来看，旅游博览会突出的应该就是“博览”二字，目的就在于为国内旅游企业提供一个展示企业形象，交流经验，洽谈业务的平台，促进中国旅游业的发展。

这也就是说，各地的参展商在方寸间的展台前，所创造再现的自身特色——江南流水的秀气、北国雪飘的美丽，大漠荒凉的壮观、古都文化的博大，这些美轮美奂的景色浓缩成的视觉盛宴，其实归根结底都是为“展示”，为“交易”服务的。

那么是否可以褪去那华丽的外表，不去追求规模，而是简洁直达主题：“如何在旅

博会中能让参会者多一点交易谈判的时间和空间，让更多的旅游交易的有效人群参与进去。”笔者认为这非但是一个非常现实和棘手的问题，同时也是旅博会举办的真正目的。

思考之二：参展商

期待旅博会带来怎样的收益和效果？

在参加这次旅游博览会之前，我询问过之前去过的同事和主办方有关于参展商的情况，发现今年参加旅游博览会的对象和去年的几乎是一样的。

到了展览现场和其他参展商交流下来，发现他们也有同样的感觉，有几位景区的负责人谈到，觉得现在各种各样的旅游交易会，博览会实在太多，景区本身已经呈现疲惫的状态，但是不参加吧，总觉得少点什么，真的花钱去了，呼隆式的促销，到最后全成了展商之间“自娱自乐的节目”，难以取得真正的效果。

回来之后我查阅了有关旅游推介会相关的一些信息资料，发现其他国家在中国举办的旅游推介会和国内所举办的形式完全不一样，比如斯堪的纳维亚旅游局，这个旅游局代表三个国家来中国推介，他们邀请的就仅仅是中国具有出境游组团资格的旅行社和媒体代表，现场中，不见礼花，更见不到前呼后拥的人群。

参加旅博会就势必都会对效果有所期

待，如果主办方在办展伊始，就能够根据不同景区的特点，创造属于该景区的宣传方式和针对性的促销手段，而不是千篇一律的在展厅发放宣传资料，相信这样对于展商收益的提高才能够是实实在在和立竿见影的。

思考之三：

对于“买家”是否要设门槛

在整个展览过程中，笔者遇到了一件非常令人皱眉的事情。

此次我馆共带去宣传单片500份，但仅仅一个小时不到的时间，这些单片就被一抢而空。而其他展商也都遇到了同样的情况，带去的宣传资料完全不够发。

但有部分参观者并不是真正需要这些资料，他们在“疯狂”的抢到这些资料后只是随意一撇，变将宣传页一卷塞进了包里；更甚者在发现宣传单页上没有优惠促销信息后更是就随手一扔。

在晚上展览结束的时候，整个展厅可以说是宣传纸片满天飞，展厅的通道上，拐角处里，几乎到处都可以找得到被丢弃的各种印刷品。真的很难想象，这要浪费多少钱。

从某种意义上说，既然是个博览会，那也就是一个交易会，一个“买卖”会，参观者“买”旅游产品、参展商“卖”旅游产品。旅游景点是“卖家”，旅行社、参观者是“买家”。

但是那些在展厅内随意丢弃宣传页的、为了景区发放的纪念品不惜来多次的，甚至带上干粮进来坐在拐角处等地方“躲空调”的……，在他们之中几个是真正的“买家”呢？

免费入场固然无可厚非，但这也造成了因为看到展厅内“人山人海”的景象而产生退缩心理，放弃参观的；甚至因为“人满为



患”不能进入展厅而被拒在旅博会外场等现象的发生。

买家因为种种原因无法进入展厅，这似乎也是有悖于交易的规律吧？所以笔者认为，适当的给参观者设立“门槛”，让真正的消费方入场，这非但符合旅游交易会的市场运作，同时也是参展商所希望看到的景象。

就在参加旅博会回来之后，一次无意间看到华东旅游报的记者吴仲银采访澳大利亚旅游局中国区经理兼首席代表邓李宝茵女士的一篇报道，报道中她关于游客的“满意度”比游客数更重要的观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那么，同样的，举办旅游交易会，参展商，参会者的满意程度也很重要。

多年来的市场培育，使得中国的旅游展会已经与今天社会中的许多行业息息相关，旅游业的和谐已经成为社会整体和谐发展的一部分。

而此时，旅游博览会只有真正的起到带动地方旅游产业发展、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目的。才能成为向世界展示中国旅游繁荣和谐形象的一扇靓丽窗口。

“追寻宋庆龄的美德”征文比赛随想

撰文/许毅捷

“追寻宋庆龄的美德”——中学生有奖征文比赛，作为宣教部09年上半年度的一项重点工作已经圆满完成。此次征文活动从2008年11月开始征稿，2009年4月底进行颁奖，历时半年，涉及12所宋庆龄班所在的中学，共收到各校选送征文248篇。笔者有幸负责选送征文的初选工作，对获奖征文的优势与未获奖的多数征文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相信这对今后的工作还是有所启示的。

一、获奖征文的特点：独特性

1. 志愿者的独特经历成就了获奖的征文

此次征文比赛的参赛对象是12所宋庆龄班所在的中学，每到寒暑假期间，各所中学都会选派一些同学来我馆进行志愿者服务。从这次征文比赛的情况也可以看出，获奖的同学其中有相当部分就是这些曾经来我馆当过志愿者的同学，他们对于故居，对于宋庆龄有着更深层次的感受，他们会借樟树抒情，会从服务实践中归纳总结……所以，他们的文章与其他没有这段经历的同学的文章相比，更具真情实感，显得与众不同。

2. 详实的资料带来了独到的感受

应该说，此次征文比赛的选送征文都是同学们动过脑筋、查过资料的结果，这些资料中，有的来自书本，有的来自网络，还有一些来自我们的宣讲材料。明显可以发现，宣讲过的学校选送来的稿件，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让我们觉得欣慰，从获奖的情况来看，宣讲过的学校同学获奖的数量也比较多。此次进行的宣讲就是以宋庆龄的美德为主题

的，所以对于此次征文的写作是很有帮助的。可以说，此次的征文也是对我们宣讲工作的一种很好的反馈。

3. 创新——灵魂闪着光彩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从这些选送征文当中，欣喜地发现了那些闪着光彩的灵魂，就有一篇文章，以时空穿越的形式，让宋庆龄来到当代，与我们面对面地对话，用现代的眼光去看待她，她的学生时代，她的革命生涯，她的安详晚年，用当下的态度去衡量她，她的言行，她的笑容……的确，对于90后的一代来说，伟人远去的背影，也带走了她笑容的温度。然而，时空的穿越，又让她的笑颜真切起来，于是，宋庆龄的美在新的时代又有了新的定义，这是对创新的一种勇敢的尝试。

二、多数未获奖的征文

所呈现出来的特点：雷同性

获奖的征文终归是少数，着眼于大多数未获奖的文章，对于整个中学生群甚至是整个时代文化氛围的把握更有意义。本次征文所呈现出的雷同性令我讶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完全相同的两篇文章；二是文章格式的雷同；三是所举的例子的雷同。

首先来看完全相同的两篇文章。在选送来的200多篇文章中，有两篇来自不同学校、不同年级的文章，内容却一字不差，唯一的区别就是二人的排版。笔者在读到第一篇的时候还觉得不错，可当发现另有一篇完全一样的时候，着实有些上当受骗的感觉。

其次对于文章格式的雷同性。多数文章都是一个模版下的作品，先概述宋庆龄的生平，说她如何伟大；然后另起一段，举例说明她的优秀品德；接着再提出我们要向她学习，或再说说世博会的召开，我们要把美好的品德发扬开去。应该说，这样的文章是不会犯错误的，但也是没有想象力的文章。

最后再来说说例子的雷同性。保守估计，这些选送来的征文中至少有一半的文章所选用的都是宋奶奶小时候信守诺言放弃随家人出门，而在家等同学的故事。据笔者调查，这个诚信的故事之所以深入人心，主要是因为这个故事曾经出现在语文课本里。真的很遗憾，我们列出了那么多的参考书目，竟没有一本薄薄的语文书来的有分量。

造成选送征文雷同的原因，笔者做出大胆地做出猜测，提炼出以下几条原因：

1. 抱有完成任务的心态

此次征文活动要求的截稿日期是2009年2月15日，几乎所有的学校都将此篇文章作为寒假作业的一项布置下去。一般来说，学生对于寒暑假的作业都是持有排斥态度的，许多同学都是在刚放假或是开学前把作业草草了结掉的，所以在这种重视数量、忽视质量的心态下，完成的作业质量可想而知。于是，网络的介入，满眼的抄袭、引用，炮制出了一篇篇雷同的作品，以此来交差了事。

2. 思维模式的定式

“起承转合”，似乎已经不再是一种模式，而成为了一种定式，由于它的万试万灵，所以一代代地传了下去。教育者们不断讨论着“授之以鱼”还是“授之以渔”的命题，但常常分不清“鱼”和“渔”的区别。教育留给专家们去研究，在笔者看来，那些遍体鳞伤的是那些与生俱来的想象力。

3. 没有思想的快餐时代

无可非议，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快餐的时代，没有精雕细琢，没有反复推敲，对于过程没有要求，结果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快餐时代，也可以说时没有思想的时代，一切都是按部就班，结果就成为了一种必然。所以，我们没有权利去怪罪我们的孩子，他们的一切都是来得那么容易，不用思考、不用挖掘，前人们把捷径告诉他们的同时，他们就不再需要在探索中前进，所以他们对于美德的理解是那样的单薄、狭隘，说他们无法从宏观角度把握也好或是欠思考推敲也罢，照搬照抄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习惯。

三、对今后工作的启示

基于上述所涉及的问题，我想到了几点对于今后的工作的启示。

1. 志愿者在保证质量的同时，尽可能地让队伍扩大，让更多的同学或是市民能够走进故居、走近伟人。

2. 寒暑假期间，鼓励来馆服务的中学生志愿者带自己的好朋友一起来馆参观游览，假期的孩子们需要交流的场地，我馆也可以更好的起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作用，应该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3. “走出去·请进来”，更多地走出馆门，外出宣讲。也可以利用学校兴趣课、活动课的时间，把同学们请进来，在香樟树荫下走走，增加互动性的交流。

4. 及时更新我馆的网站，把我馆的情况通过网络这个媒体更好地推介出去。

在工作中，有时我们会哀叹这个快餐文化盛行的时代，使得文化的传承有些流于形式，但若是收起这份哀叹，想办法把内涵填充进去，相信还是会有成效的，同时这也是我们的责任。

接待久保田夫妇

撰文/仲灵颖

2009年6月9日上午十时左右，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久保田文次先生携其夫人久保田博子女士在孙宋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来到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参观，作为宋故居的一名讲解员，我有幸参与了这次的接待工作。

久保田夫妇对中国的历史抱有极大的兴趣，特别是中国近代史。久保田文次先生是日本著名的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学者，对孙中山的研究比较深入，他曾多次来到中国参加学术交流活动或进行演讲，其夫人久保田博子女士是日本宋庆龄基金会代表理事，较为侧重对宋庆龄的研究。夫妇俩此次应同济大学的邀请来沪交流学习，也顺带参观孙中山和宋庆龄在上海的故居，追寻这两位伟人的生平事迹。

久保田夫妇在上海参观行程的第一站便



是上海宋庆龄故居。当天下着濛濛细雨，他们进馆后，首先来到主楼进行参观。通过交流得知，文次先生并不是第一次到访上海宋庆龄故居，多年前他曾经作为一名游客到此参观，据他自己回忆，当时一起参观的人比较多，所以没有细看，只是粗略地看了一圈。在室内参观时，久保田夫妇两人看得极其仔细，对于讲解的内容也听得非常认真，时不时提出一些问题或谈一谈自己的想法，与我们进行探讨。

一进过道厅，博子女士就问到了室内文物的陈列情况，我告诉她：“室内文物的陈列基本保持了宋庆龄居住在这里时的原样，90%的物品都是原物。”她听了之后不由地发出赞叹：“保存得真是太好了！”当文次先生看到林伯渠赠送的“百鸟朝凤”和徐悲鸿画的“双马图”时，还兴奋地拉着夫人博子一起讨论。

在客厅，夫妇两人都分别在孙中山和宋庆龄的照片前看了很久，难掩心中的激动，感叹着当时的岁月。当我介绍到日本友人赠送的灵芝图案的脱胎漆盘是时，文次先生显得十分激动，希望知道此物是当时何人所赠。据我们所知，这个漆盘是日中贸易促进议员联盟1956年赠送给宋庆龄的，但具体的人名我们还不得而知，文次先生点头表示

理解。

在二楼卧室看到宋庆龄的那套藤木家具的嫁妆时，久保田夫妇两人的目光中立刻流露出一种见到久违的老友时的欣喜之情，因为他们只是在书中了解过这套家具，一直想亲眼看一看，今天总算是如愿以偿了。随后，博子女士问到了宋庆龄的打字机，于是我引他们来到由卫生间改变成的打字间，夫妇两人起先十分诧异，博子女士告诉我，在他们看来，这里的打字机应该是放置于卧室的，北京宋庆龄故居便是如此，在我的解释下，他们慢慢解开了心中的疑惑，博子女士笑着说：“在卫生间安放打字机可见宋庆龄平时为人处事时的小幽默。”

当我介绍到宋庆龄和保姆李燕娥经常会在办公室的小餐桌上用餐时，博子女士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说了“李姐”二字，并问我‘姐’是否是汉语中‘姐姐’的意思，我告诉她：“虽然宋庆龄称李燕娥为‘李姐’，但她的实际年龄却比李燕娥大许多，这样称呼是宋庆龄对李燕娥尊重的体现。”博子女士了解后频频点头。

在李燕娥的卧室，我们谈到了宋庆龄为李燕娥安排后事的问题，博子女士感慨地说：“宋庆龄是一个伟大的人，但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神’一样的存在。在政治上她严肃、认真，而在生活中，她对李燕娥的态度说明她也有普通人的一面，她有她自己的情感。”

在整个主楼的参观过程中，我发现久保田夫妇有着十分渊博的历史知识，只要是和宋庆龄相关的人物，无论和他们谈到谁，他们都能很快地反应出这些人的事迹，诸如林伯渠、加里宁、苏加诺、宋庆龄的父母，甚至于当时宋庆龄身边的工作人员，夫妇两人

都十分熟悉。记得在看到宋庆龄的母亲倪珪贞的油画像时，博子女士就十分清楚地告诉我倪珪贞曾经就读的学校名为裨文女学，让我不禁赞叹她的知识和记忆力。

在主楼的参观结束后，我们便计划带久保田夫妇去文物馆继续参观。因为考虑到他们两位都是年近古稀的老人，所以在主楼的进出口处，我们播放了主楼的介绍短片，以便让他们稍作休息。但文次先生看到短片时仍是激动满怀，原本已经坐下的他，又站了起来，走到电视机前近距离地观看短片中的每一幕场景，这给了我非常大的触动，我为他们的研究热忱而感动，也为他们流露出的对故居的喜爱之情而自豪。

从花园出来，久保田夫妇来到了文物馆参观。与主楼不同，在文物馆内，久保田夫妇能看到更多更详尽的文字资料和照片，也因此，他们两人在文物馆的兴奋之情不亚于在主楼内。

在第一个板块，宋庆龄1912年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校刊上发表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一文深深地勾起了博子女士的回忆。她高兴地拉着我说：“我当时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内心十分地感动。宋庆龄当时的文字里充满了激情。正是因为看了这篇文章，我开始了对宋庆龄的研究。”后来经我们的询问，她又告诉我们这已是30多年前的事了。说这些的时候，她的表情和言语中都略带着一份羞涩，我想，她也许是想到了自己年轻时候的事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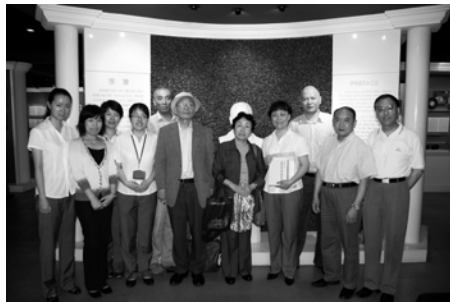
接着，在看到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婚姻誓约书时，博子女士指着最后的签名问：“宋庆龄具体是在何时开始用现在这个‘龄’字的？”这个问题让我们大家都有点愣住了，因为我们也不是非常清楚。博子女士认为

宋庆龄在日本期间使用的应该仍是早期的“林”，因为在日本方面所有记载着宋庆龄名字的资料中显示的都是当时的“林”，没有提及到现在使用的“龄”。文次先生也提出疑问：“当时是何原因要改名字？而且姐妹三人还是一起改的，是不是有什么含义在其中？”而我们这边当时并不能给出一个具体的答案。其实关于宋庆龄的许多问题，到现在还有一些是悬而未决的。就比如后来又和久保田夫妇谈到的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的身世之谜，学术界有多种说法，我们现在也只是选择其中一种证据比较有说服力的“过继说”来作为主流看法。久保田夫妇也是学者，所以我们互相之间都能够理解现在这些问题的无正解性。

之后因为时间有限，所以各个板块都看得比之前粗略了许多。我带他们具体看了宋庆龄出访各国时的影像资料，听了宋庆龄1952年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上的发言，两位老人的神情始终非常地专注和投入，博子女士还诚恳地笑着对我说：“宋庆龄的声音真的是很可爱啊！”我当时有一些哭笑不得的感觉。

在最后寓所生活的板块，博子女士明显对宋庆龄的“香云纱”旗袍产生了兴趣，询问是否是当时宋庆龄身边工作人员制作的，因为她在北京宋庆龄故居看到一些当时由工作人员缝制的衣物。我向她解释说不是，但后期为了能继续穿着，也是经由他人改动了一番的。

在整个文物馆的参观过程中，久保田夫妇连连赞叹文物馆中的高科技设施，这让他们得以了解以前从未接触过的资料。正因如此，夫妇二人最大的感慨是他们对于宋庆龄的了解也仅仅是冰山一角，认为两人今后还



有许多地方需要不断努力学习。而他们一大的遗憾则是因为时间有限，无法仔仔细细地将所有资料和文物看完。他们这种谦逊的态度和孜孜不倦的研究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我们还太年轻，缺乏的就是这种精神，现在正是我们需要好好磨练的时期，因为还有包括上述问题在内的许多谜题等待着我们一步一步耐心地去揭开被隐藏在神秘面纱之下的谜底。

在本次参观行程的最后，久保田夫妇向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赠送了两份日本方面孙中山和宋庆龄的研究资料，由偲青燕书记作为纪念馆的代表接收。此后，久保田夫妇还以文物馆内的半身雕像为背景与书记及陪同参观的工作人员一起合影留念，临别时还与大家一一握手致谢。至此，长达两个小时的参观行程告一段落。可以说，本次行程的目的已不仅仅是单纯的参观，更多的是双方之间的交流探讨。在此过程中，我们都相当的愉快，彼此之间通过热烈地交谈也都得到了许多新的信息和知识，所以这对于我们双方来说都是一次值得珍视的交流学习的机会，它也将永远浮动于我们的记忆之中。

谈谈博物馆的临时展览

撰文/傅强

陈列是博物馆实现社会功能的主要方式，博物馆陈列可分为基本陈列和临时展览。从功能上来说，二者既相一致，又有所区别。基本陈列无论在形式和内容上都经过仔细的研究和论证，代表了一个馆的研究水平和展示水平，是体现一个博物馆性质和任务的陈列。而临时展览则紧跟时代脉搏，反映社会热点，和群众生活结合比较密切，内容涉及广泛，更新快，可以满足不同观众多方面的文化需求。近些年，临时展览越来越受到博物馆的重视，就我馆来说，在去年完成了文物馆的陈列改版之后，也将陈列工作的重点放到了临时展览上，近一年来，已举办了《宋庆龄在上海》、《琼英留韵——宋庆龄与妇女解放》、《清菊雅石——宋庆龄的高尚品格》三个小型临时展览，这些临时展览吸引了大批观众，既丰富了我馆的陈列内容，又提高了参观人气，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和好评。作为一名宣教部的工作人员，笔者深切体会到临时展览对博物馆的重要性，也产生了一些对临时展览工作的体会。

选题是临时展览的灵魂

正如上文所述，基本陈列是一个博物馆的代表性陈列，它必须要全面而系统地反映该馆的性质和馆藏文物的特色，包含历史、科学、审美等多种信息，是一个博物馆的“底气”所在，也是该博物馆的“招牌”。所以，基本陈列往往有着比较稳定的主题、内容、展品和较完美的艺术形式，展览的周期往往长达十年八年，这就造成了许多馆藏文物由于不能纳入基本陈列而被深藏密窖，

许多独具特色的专题内容不能被深入挖掘。

临时展览恰恰在这一点上可以成为基本陈列的补充，它的选题更加自由和多样化，既有广度上的优势——可以涉及陈列主体的方方面面；又有深度上的优势——作为专题性的展览，可以对某一事件、专题进行充分的展示；也有时效的优势——可以抓住社会的热点，结合自身的资源，以鲜明的时代特征先声夺人、借时造势，让自己的展览不仅满足观众的需要，也满足社会教育的需要，实现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这也使得临时展览的选题显得尤为重要，好的选题既把握时代的脉搏又充分考虑到本馆的实际，找到了馆藏资源与社会需求的“结合部”，在恰当的办展时机拿出最合适的展览内容。这样的展览无论是展览策划、内容编辑还是宣传造势都会相对容易，而展览的效果也往往事半功倍。而一旦选题失误，则展览的策划、内容的组织和宣传工作往往都要付出更多的心力，甚至免不了生搬硬套，而展览的效果却往往不尽如人意。

例如，在今年的五四青年节，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推出了一个规模很小的临时展览：

《五四运动与重庆青年》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文物特展，展出了五四运动时期的文物“聂荣臻赴法勤工俭学时的家书”、“万县学生救国会白话广告”、“为山东交涉泣告全国父老兄弟书”、“广安县商业爱国全宣言”、“重庆商学联全会简章”、“留日学生代表电省督军署书”、“重庆闹学联合会抵制日货详细办法决议案”等共10件，照片

3张。展览的规模虽不大，但是社会反响却十分良好，不仅重庆市的青年们被纷纷吸引前来参观，该展览还引起了共青团中央和重庆共青团市委的重视，各大媒体、网站也纷纷予以报道。在今年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全国各地的团组织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主题歌会、文艺演出、大型论坛、志愿者活动，这些活动虽然各具特色，却缺乏独创性，而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文物特展无疑成为了这些活动中的一个亮点，“五四运动与重庆青年”这样一个优秀选题既紧密结合社会的热点，又充份利用了博物馆的独特资源，使该展览成为了本次纪念活动中的一项独一无二的活动，正是由于独具特色，这个临时展览也吸引了媒体的目光。博物馆搭台、文物唱戏、媒体造势，三管齐下，使这个临时展览成为了因选题成功促成展览成功的典范。

特色与创新是

临时展览的魅力所在

好的选题只是展览成功的第一步，在确定选题之后，就要围绕该选题组织展览的内容，有了内容，还要找到恰当的形式去表现它，正是主题、内容、形式的三者的合一才能打造出一个成功的展览。笔者认为，在内容组织和形式设计方面，特色与创新是两个最为关键的要素。

由于基本陈列要完整、全面的反映陈列主体或馆藏文物，所以内容分布上往往较为平均化、展线上也容易走平铺直叙的路线。而专题性的临时展览，受制于场地和展出时间，就不能求“面面俱到”，而应突出主题、突出重点、突出特色，以鲜明的主题、鲜活的内容、鲜亮的形式来吸引人。但是，要突出特色也不等于标新立异。特色展览不

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虽然当下的学术研究百花齐放，不同的观点百家争鸣，但是博物馆的展览不应该一味追新或人云亦云。一个与众不同的展览应该根植于扎实的学术研究和丰富的馆藏资源。例如本馆于今年五月份推出《清菊雅石——宋庆龄的高尚品格》图片展，该展览以“目前国内首个以宋庆龄的道德品质为主题的专题展览”为特色，这就不是凭空的创造，它的内容组织和编排是以宋庆龄研究会和本馆多年来对宋庆龄生平思想的研究为依托，它既是原创，但同时也是总结和升华，所以，该展览得到了上海社科联的认可，成为了第八届上海市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周的特色科普活动。

无论是基本陈列，还是临时展览，无论是什么样的主题，什么样的特色展览，都要考虑怎样去吸引观众，否则无论是社会效益还是经济效益都无法实现。对临时展览来说，其时效性意味着它更应该具有吸引观众的魅力，以利于在短期内达到预期的效果。这种魅力需要有意识地去营造，使观众置身于一种独特的氛围中流连忘返，并促使观众去欣赏、去品味、去思考。而氛围的营造贵在创新，既要使形式与内容完美结合，又要令人耳目一新，即：以特色来吸引人，以创新来打动人。

这里所说的特色与创新既是两个独立的要素，但又不是相互割裂的，一个成功的展览往往正是这两个要素的有机结合。例如今年是浙江省博物馆建馆80周年，在6月份，该馆推出了“十大镇馆之宝”的评选活动，并同时举办了“国之瑰宝——浙江省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候选文物汇展”。该展览被称作是浙江博物馆自1929年成立以来最重量级的展览，浙博经过反复研究、讨论，从

10万余件藏品中筛选了30件作为候选名单，其中包括历史文物类18件，陶瓷类4件，书画作品4件，工艺类4件。这些文物涉及到史前文明、元明清书画、佛教文物等浙江省博物馆馆藏的特色和亮点。既有唐代“彩凤鸣岐”七弦琴这样的“精品”，又有南宋拉绒棉毯这样的“孤品”，还有元代黄公望《富春山居图》这样的“神品”。这些展品时间跨度大、种类也各不相同，如果平白无故的放在一起并不合适，但是，以评选“十大镇馆之宝”的名义，它们就被理所当然的整合在一起，成为了一个特色展览。对浙江博物馆来说，这既是一次馆藏“国宝”的总动员，也是一次全民参与博物馆“品宝”的文化盛事，它将文物展览与当下十分热门的“鉴宝”、“评宝”活动结合起来，让人们在“赏宝”、“选宝”和“评宝”的过程中与展品产生互动，既获得更多的文博知识，也得到了精神文化的享受。在笔者看来，此次展览正是特色内容与创新形式的完美结合，该展览开展前三天参观人数就已上万，收到“十大镇馆之宝”选票3000余张，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宣传是临时展览的成功要诀

展览的目的是为了让观众来看，而衡量一个展览的成功与否，观众的数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作为革命历史类的纪念馆，我们担负着教育人、鼓舞人的责任，而观众的数量多少就直接影响到宣传教育的效果。因此，在办好展览的同时，不应忽视对展览的宣传。临时展览往往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如果在恰当的时机，结合社会热点和媒体的关注点，适时推出临时展览的宣传不仅效果明显，还可以借社会的力量来宣传我们的展览，以较少的投入实现宣传效果的最大化。

例如对《清菊雅石——宋庆龄的高尚品格》图片展的宣传，我们通过对展览主题的提炼，将此展览与上海当下如火如荼的“迎世博”活动结合起来，将我们的展览纳入到上海市“迎世博”的系列活动中，让我们的展览借社会的热点“顺势”得到宣传，而不是被其冲淡。再比如我馆在今年“三八妇女节”期间推出的《琼英留韵——宋庆龄与妇女解放》图片展在宣传工作上就走了一条多元化的路线。一方面对本次展览进行包装，将参观展览、门票优惠、纪念品销售作为妇女节特色活动组合打包向社会推出；另一方面，我们还借助了社会团体的网络组织，借社会的力量向各区、各街道的妇女团体推出我们的展览。

同时，针对临时展览展出时间短、时效性强的特点，提早作好展览预告，便于观众自由安排参观计划；设计新颖、醒目的大幅海报安装在本馆的显著位置；随时向社会传达临时展览信息，注意媒体的沟通联系，注意宣传的多元化，注意新兴媒体的运用等等，这些也都不该被我们所忽视。

综上所述，临时展览时间上虽为“临时”，却非急就章，规模虽小，却不意味着可以偷工减料。当然，一个展览的成功因素有很多，除了上文所述，各级领导的重视、社会各方面的支持、馆内各部门的协作、优质的服务等都是展览不可缺少的。在现代社会人们的文化需求越来越趋向多元化，社会对博物馆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走出高高在上的象牙塔，不再固步自封，深入到广阔的社会大舞台去感悟时代脉动、挖掘社会热点，尽可能多地办一些贴近社会、贴近生活、贴近观众的陈列展览，是时代的呼唤，也是我们博物馆人的义务。

一张照片的考释

撰文/宫洁菁



此照陈列于宋庆龄故居主楼客厅内，故居的解员讲解的时候都会着重提到这张照片，称“1956年，孙中山诞辰90周年之际，《建国大纲》线装本再版，宋庆龄非常高兴，于是手持《建国大纲》拍了这张照片”。

在登录鉴定馆藏照片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当时宋庆龄是穿同一套衣服，在同一个地点拍摄了一组照片，有黑白的，有彩色的，尺寸不一，看照片的取景及灯光布置可知是专业摄影师所摄。客厅里悬挂的这张是从这组照片中挑选出来放大的。照片中的宋庆龄妆容得体、神态宁谧、表情自然又不失

高贵，笔者个人认为这是建国后宋庆龄所拍摄的生活照中最成功的一组。然而关于这组照片拍摄的地点与时间，笔者在重新做了一番考证后，有了一些新的发现。

首先，确认照片拍摄的地点。

宋庆龄解放后在北京曾有过三处寓所。一处东城区方巾巷，1949年至1959年10月（《宋庆龄书信集》续编第353页，宋庆龄致王安娜的信中明确提到了她搬离方巾巷的时间）居住；一处北海西河沿（今西城区前海西街），1959年至1963年居住；最后一处后海北河沿醇亲王府西花园，1963年至1981年（北京宋庆龄故居有明确记载）居住。这三处住所中，我们对于第三处比较熟悉，而一、二处则相对比较陌生。首先是方巾巷寓所，方巾巷寓所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有关宋庆龄的著作、画册、文章中都没有完整的介绍寓所的文字或图片。笔者翻阅



了很多资料，最终在《宋庆龄画传》这本书里意外的发现了一张非常清楚、完整的拍摄方巾巷寓所整体外观的图片。将这张图片与照片里宋庆龄身后的小楼对比，一模一样。

之前有一种“流传”颇广的说法，称“出于建设北京火车站的需要，方巾巷寓所被拆除了”，其实不然。笔者的同事不久前去北京出差时，在火车站附近的朝阳门南小



街找到了宋庆龄的方巾巷寓所，据有关人员介绍，此楼从未拆过，现在是外交部的办公用房。从同事拍回的照片看，小楼的外观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色调、风格，甚至屋顶上瓦片的样式，都仍旧保持着当年宋庆龄居住时的样子。将照片跟《宋庆龄画传》中的图片，以及笔者所要考证的这套照片比照，可以看出，这三张照片虽摄于三个不同的时间，但确是同一个地点，那就是当时的宋庆龄的方巾巷寓所，现在的朝阳门南小街439号。

宋庆龄在方巾巷寓所居住的时间并不短，建国初期的10年基本上都是在那里度过的。仔细观察图片和照片的各个局部，笔者发现50年代宋庆龄在方巾巷寓所拍摄了很多非常不错的生活照。有一系列宋庆龄手持葡萄在庭院里散步时拍的照片，还有一组宋庆龄喂养鸽子的照片，几十张之多，照片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捕捉了宋庆龄闲暇生活的几个

瞬间，很生动，宋庆龄的表情非常自然、恬静。照片的背景就是方巾巷寓所的二层小楼或庭院的局部，十分清晰。这些照片已成为记载方巾巷寓所原貌的重要“凭证”，其价值不言而喻。

综上，确定了方巾巷寓所这个地点，照片拍摄的时间也就可以限定在1949年到1959年之间。本馆藏品“线装本《建国大纲》”上明确印有出版时间：1956年11月，所以，既然宋庆龄手持《建国大纲》，那就可以把照片拍摄的时间范围缩小至1956年11月至1959年10月。

接下来，要确定照片拍摄的时间。

1956年是孙中山诞辰90周年，宋庆龄以她自己的方式缅怀丈夫。她撰文《孙中山——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的儿子》以及《回忆孙中山》，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同时，她在上海孙中山故居先后3次整理出了一批珍藏了30多年的孙中山的重要文献和遗物。同样为了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1956年11月，孙中山的重要著作《建国大纲》线装本重新出版，宋庆龄于11月6日在上海为该书题写书名（《人民日报》载）。《建国大纲》是孙中山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4月12日公布的，它是孙中山从旧三民主义向新三民主义转变时期的理论结晶，它的撰写和公布是孙中山成为革命的新三民主义者的一个标志。因此，1956年其线装本再版，宋庆龄十分高兴，于是也就有了上面那一组珍贵的照片。这是我们一贯以来对于照片拍摄时间的想当然的解释，看似合情合理。可是，仅凭这点线索就可以断定照片一定是1956年拍的吗？隔了一段时间再把心爱的书拿出来作为“道具”拍几张照的可能性就不存在吗？

笔者仔细看了宋庆龄1956年11月及12月的来往信函和活动记录，都显示她当时并不在北京，而是在上海。

11月9日，在上海孙中山故居整理孙中山遗物；

11月13日，在上海寓所接见苏联代表团；

11月15日，章汉夫致宋庆龄信，“上海外事办转送”字样；

11月20日，致黎照寰信，信中内容显示她不在北京；

11月27日，罗瑞卿致宋庆龄信，信封地址为上海寓所；

11月30日，张福星致宋庆龄信，信中多处内容显示宋在上海，且住了较长时间；

12月6日，在上海参加日本商品展览会。

从宋庆龄1956年与朋友的来往信函的内容可以看出，当年宋庆龄因为国务繁忙，身体状况并不是很好。1956年2月初，她结束对印度、缅甸、巴基斯坦三国访问，8月又出访印尼，9月底在北京接待来访的苏加诺总统，直到10月初回到上海，在上海寓所再次接待苏加诺总统。宋庆龄一直比较习惯上海的气候，喜爱住在上海，觉得上海是回



家，是休息，而去北京是上班。1956年经过一年如此高密度的外事出访和接待工作，年末回到上海长住一段时间修养身体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不可能在这短短三个月里还抱着病体抽时间往返京沪。此外，据宋庆龄身边的工作人员周和康记载的工作日志所述，“宋庆龄于1956年10月8日回到上海家中居住，直至1957年2月20日飞回北京”。综上所述多项事实印证，1956年11月《建国大纲》出版后，宋庆龄一直都在上海，不可能在北京的方巾巷寓所拍下这组照片，因此照片的拍摄时间不应该是1956年。

既然排除了1956年，那么照片拍摄的时间只有可能是1957年至1959年10月。再细看照片，可发现照片里的背景除了二层小楼，还有大量的植物，多是菊花、一串红，笔者咨询绿化专家后了解到，菊花的生长季节是秋季，其自然花期一般是从8月下旬到11月中上旬，一串红的花期较长，从夏季到第一次下霜，照片上的一串红已呈现出凋零的状态，菊花生长正旺，因此，推测照片拍摄的时间应是在9月下旬、10月或11月上旬，当时宋庆龄的穿着也可以印证这一点。

这样，时间就可以限定在1957、1958、1959年三年的9、10月间。

根据宋庆龄1958年10月左右的往来书信和活动记录可知，那段时间宋庆龄正集中在上海进行视察、外事接待等国务活动，不可能在北京。

9月25日，在上海寓所会见印尼妇女代表团；

10月10日，在上海寓所会见苏中友好协会代表团；

10月16日，在上海寓所会见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等国妇女代表；



10月17日，视察上海国棉十七厂；

10月18日，视察上海郊区“七一”人民公社；

10月20日，在上海寓所设茶话会欢迎保加利亚国民议会代表团；

10月23日，在上海寓所会见伊拉克人民访华团；

11月21日，康克清来函，信中内容显示宋庆龄一直都留在上海视察基层工作；

11月26日，李云来信，信中内容显示宋在上海；

12月4日，在机场欢迎金日成。

由此，和1956年的情况一样，我们又可排除1958年。剩下1957年和1959年两种可能性。

1957年10月18日，宋庆龄离开上海到达北京，准备11月份随毛泽东一起出访苏联。

11月2日，一行人离京赴苏。如果照片摄于1957年的话就只可能是10月18日至11月2日这段时间中的某一天。宋庆龄在1957年10月26日致王光美的信中写到，“……近日我因准备出国的事比较忙，精神上比较紧张……”，由此可知，出国前这段时间里，宋庆龄正在紧张的筹备访苏事宜。在公务如

此繁忙的时刻，穿戴打扮好，并且约好专业摄影师，拿出《建国大纲》来，在寓所的里里外外拍摄了一组照片，虽不是没有可能，却有些牵强。

如果我们假设照片是摄于1959年，那么就合理得多。因为1959年10月宋庆龄就要离开方巾巷寓所搬到北海西河沿居住，毕竟方巾巷是住了近10年的地方，临走的时候拍摄一组照片作为纪念，此乃人之常情。《建国大纲》是宋庆龄非常满意的纪念丈夫孙中山的一种载体，一直都悉心珍藏着，因此在这组照片中有几张是她手持《建国大纲》拍的。

综上，根据现有材料，笔者将这组照片的拍摄时间推测在1959年9、10月间。由于尚未找到过硬的直接证据证明此结论，所以进一步的考证工作仍进行中。欢迎各位读者提出商榷意见。

参考文献：

- (1)《宋庆龄画传》，作家出版社，2006年5月版
- (2)《宋庆龄年谱》，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版
- (3)《宋庆龄书信集续编》，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版

印度镶银铜盘

撰文/麦灵芝

上海宋庆龄故居餐厅的壁炉上方，挂着一件镶银铜盘。铜盘直径43厘米，正面有精美的装饰图案，以印度教湿婆神的舞神相为中心，由内向外有三组环形图案，围绕着湿婆舞神相。每个环形图案分别由8到10组相同的图案组成，每组图案都以表现人神、花鸟为主，具有浓郁的印度风格。

镶银铜盘中心的舞神相源自印度教的三大神之一湿婆。印度教是印度最大的宗教，也是多神教，其主要的三大神分别是创造之神梵天，保护之神毗湿奴和破坏之神湿婆。其中湿婆是印度教中最受崇拜的神，是主宰破坏与生殖两种权能的神，他三眼四手，有无穷的威力。传说湿婆善舞，他创造了刚、柔两种舞蹈，是人间舞蹈的开创者，所以印度人也奉他为舞神。印度的舞蹈与宗教一样，是印度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把宇宙的运行规律赋予在舞蹈的节奏韵律之中。这件铜盘上的湿婆舞神形象，呈单腿站立状，在燃烧着的火环中翩然起舞。右上手持铃鼓，右下手施无畏印，左上手托起燃烧着的火焰，左下手像象鼻那样下垂，右脚踩住一个侏儒样的魔鬼，左脚上抬，身后火焰的光链喻意大千世界的轮回循环过程。湿婆之舞折射出印度教所推崇的在变幻中永恒的哲理，舞神的姿态已成为印度文化的一个经典象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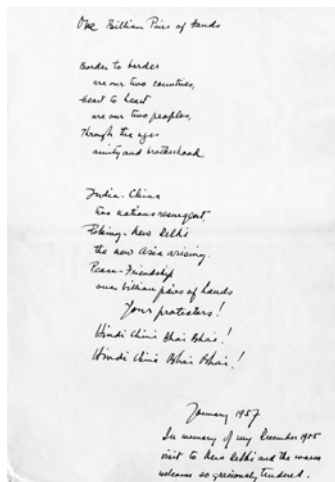
这件镶银铜盘做工精美，图案繁复，层次分明，立体感强，铜的金黄与银的亮白相得益彰。用银镶在铜盘上的图案，犹如浮雕，部分铜刻花纹点缀其中，更显其制作工艺的精湛，体现了印度宗教与传统工艺的完美结合。更重要的是这件铜盘还记录了一段中印友谊的佳话。

1950年4月1日印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印度因此成为最早与新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1951年印度派出了第一个友好代表团访问中国，代表团回国后便到各地介绍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之后印度各地纷纷成立了印中友好协会，借以推动印中两国人民之间的文化、经济、历史联系。1954年中印两国总理互访，两国领导人首先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上世纪50年代初，中

国与印度两国交往密切，共同培育了“印中人民是兄弟”的友好情谊。

正是在这样睦邻友好的背景下，1955年12月16日宋庆龄应印度共和国政府和尼赫鲁总理的邀请，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和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身份对印度进行了为期18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盛情的款待。新德里举行了近4000人的盛大欢迎会，宋庆龄在欢迎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她盛赞了中印两国的传统友谊，重申我国的和平立场，主张召开远东会议和缔结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集体和平公约。宋庆龄的讲话引起强烈反响，印度各大报纸纷纷发表社论，支持宋庆龄的讲话，认为讲话“反映了鼓舞人民取得伟大成就的伟大精神。”印度总理尼赫鲁称赞宋庆龄“不仅坚如磐石，而且成为给予别人以光明的灯塔”。印中友好协会也专门为宋庆龄举行招待会，会上潘尼迦代表印中友好协会向宋庆龄赠送了这件印度镶银铜盘，表达印度人民对宋庆龄和新中国的深深敬意。访问期间，宋庆龄不光拜会了印度的首脑和各界政要，还到工厂、农村、医院、研究所、名胜古迹参观、出席各地印中友协和妇女团体的欢迎会，发表广播讲话，所到之处都受到了极为热烈的欢迎。印度人民的盛情给宋庆龄留下深刻的印象，她在回国后的报告中写道：“人民和政府对我们这个新的国家的热情，他们与我们之间日益发展着的友好关系，以及他们对于我们的热烈希望，令人感觉到这种情感存在着巨大的力量”。

回国后宋庆龄一直难忘印度人民的深情厚意。她把镶银铜盘挂在了寓所餐厅的壁炉上方，作为对印度人民友谊的珍视。两年后她又专门作英文诗一首，纪念这次出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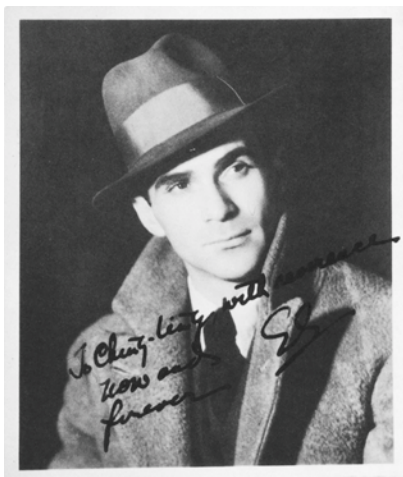
所受到的热情友好的欢迎，题为“一万万双手”。

我们两国山水相连，
我们的人民心心相印，
世代和睦如兄弟。
印度、中国。
两个觉醒的民族，北京、新德里，
正在崛起的新亚洲。
和平与友谊啊，
一万万双手是你的保卫者！
印度、中国是兄弟！
印度、中国是兄弟！

50多年过去了，铜盘依然挂在那里，它不光展示了印度精美的手工艺和悠久的传统文化。更重要的是它记录了上世纪50年代宋庆龄在中国的外交舞台上，如何以她个人的威望和魅力，为新中国树立了和平友好的形象，从而赢得了国际声誉；也记录了新中国外交史上那段“印中两国是兄弟”的历史时期。想必这些才是这件镶银铜盘的价值所在吧！

宋庆龄对《复始之旅》不实描述的意见

撰文/郑培燕



埃德加·斯诺是美国著名的作家和新闻记者，他的记者生涯，是和中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九二八年到一九四一年期间，斯诺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中国。通过目睹中国的内忧外患，他对中国人民产生了同情，增强了正义感。一九三六年越过国民党的重重封锁，冒着生命危险进入陕北苏区，进行了历时四个多月的采访。他深入访问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红军指挥员和战士及解放区群众，加深了他对中国革命斗争的了解，成就了震惊世界的名著《红星照耀中国》，他也因此成为举世闻名的记者，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斯诺一生写了大量著作，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尤其是几部关于中国的名著，曾被连续再版，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广泛发行。他的主要著作除了《红星照耀中

国》（*Red Star Over China*）以外，还有1941年出版的《为亚洲而战》（*The Battle for Asia*），1958年出版的《复始之旅》（*Journey to the Beginning*），1962年出版的《大河彼岸》（*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等，有力地促进了世界人民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了解，使中国人民为争取进步的斗争博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

《复始之旅》，1958年由美国出版公司首次出版，是斯诺记者生涯的自述。书名取意于庄子的话：“消息盈虚，终则有始。”本书将他的一生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结婚以前作为游历记者的生活；定居北京后对中国人民斗争的同情和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大战后对中国、印度、苏联等地的访问情况。书中还穿插了一些回忆和思考，尤其详细记述了他与宋庆龄、甘地和罗斯福等人的交往。这本书赢得了很高的赞誉，很多人觉得该书文笔精炼，引人入胜，书中还谈到他已赢得了“报道一贯准确的名声”。

然而，《复始之旅》出版后，关于书中对宋庆龄的描写，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例如1959年10月19日詹姆斯·贝特兰曾致信宋庆龄，请求为他关于中国的作品提供意见。信中，他提到了埃德加·斯诺在《复始之旅》中对宋庆龄的描写，他说：

“I can guess that you don't appreciate the sort of rather gossipy personal details that Ed

Snow(for instance) has put into his book Journey to the Beginning. I've tried, myself, to be a bit more careful, and hope you will think so too.”⁽¹⁾

他希望能将宋庆龄写进他的书中去，并以爱德加·斯诺在《复始之旅》中对宋庆龄的描写为例子，认为宋庆龄不会欣赏斯诺在书中对她的“相当gossipy的个人细节描写”，以此来说明自己在书中“已尽量多加注意了”。笔者将信的原文摘录出来，供读者自己去理解和体会这句话中的“gossipy”一词，在英文中有“闲谈的，漫谈式的”甚至有点“八卦”的意思，从字面上看不排除这些描写可能有想象或者杜撰的成分在里面。

而宋庆龄本人对书中关于她的一些描写也非常不满，她不止一次在给朋友的信中提及此事。1959年5月5日斯诺的妻子海伦·福斯特·斯诺⁽²⁾写信给宋庆龄，介绍在美国的情况，回顾往事，希望宋庆龄撰写自传。5月宋庆龄给海伦·福斯特·斯诺写了回信，向她描述了新中国鼓舞人心的景象并谈及撰写自传的事，信中，她批评了埃德加·斯诺的书中对她的不实描述。她写道：

“over the years what I have done and thought have been more than once been distorted and misinterpreted. Unfortunately, I

must count Ed's recent book among those, since he wrongly quoted me in several places and made me appear as something I was not, a mere reformer. I think that Ed knows better, and his use of me in his book was neither honest nor friendly.”⁽³⁾

中文译作“多年来，我以前做过和想过的事不止一次地被歪曲和错误地解释。不幸的是，我必须把埃德最近写的书（《复始之旅》）也算入其中，因为他在书中好几个地方错误地引述了我的话，使我看上去只是一个改革者，而其实我并不是。我认为埃德是了解真情的，他在书中对我的描述既不诚实也不友好。”

1960年8月，斯诺写了一封信给宋庆龄，表明不经过宋庆龄的同意，不应该发表这样的论述。对于给宋庆龄造成的任何不愉快和不方便，表示深深的歉意，并且希望能想出什么方式进行弥补。⁽⁴⁾

斯诺究竟在哪些地方错误地引用了宋庆龄的话呢？从宋庆龄给友人的信中，可以看到宋庆龄认为《复始之旅》中对她的描写有很多不符合事实的荒唐说法，很多都是斯诺为了给他的书制造轰动效应而臆想出来的，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1.关于宋庆龄父亲的出身。

在1984年中文版的《复始之旅》中，斯诺写到宋庆龄说“我的祖先是很穷的。我的亲戚从不说起，但是，我们的祖先是海南岛的客家人。几代以前，他们当中有些人移居大陆，来时身无分文只好当苦力。”⁽⁵⁾。而关于父亲宋耀如，宋庆龄自己的说法是：祖先的老家是海南岛，那里的天气很温暖，还有一个长长的海滩，父亲的父母在海南岛文昌县五指山靠酿酒为生，祖上好几代都是酿



《复始之旅》中文版封面和扉页

酒的。⁽⁶⁾据考证，宋庆龄祖姓韩，海南文昌韩世家族据谱系记载是1197年从原住地河南安阳因避战乱南迁。宋庆龄知道自己的祖籍是海南文昌，但是祖上究竟是何方人氏，以何为生，也许宋庆龄本人也知之甚少。她的这个“祖先几代酿酒为生”的说法，可能是父亲告诉她的，也可能是她自己这么认为的，因为她的父亲留给她一些好酒，以前父亲在家里有一个酒窖。

2. 关于她如何离开家赴日本与孙中山结婚的问题。

在1984年8月版的中文《复始之旅》中是这样写的：宋庆龄说“父母说什么也不同意我去日本，想把我锁在屋子里。我从窗户里爬了出来，在女佣的帮助下逃了出来。”⁽⁷⁾我们在很多资料上都能看到宋庆龄如何被父母锁起来，如何从家中爬窗出逃，赴日本和孙中山完婚的过程，大多来自于斯诺的这本书。包括爱泼斯坦所著的《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一书中，也有“卧室的门被反锁”这样的描述。对于这样的说法，宋庆龄在给友人的信里面驳斥说这是斯诺自己虚构的想象！

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和孙中山是非常好的朋友，宋耀如是最早的“同盟会”成员之一。为了开展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活动，在家中开印书馆，印刷和散发革命小册子，同时印基督教作品做掩护。宋家父母不想让宋庆龄去日本工作，完全是出于爱女之心，不想让她受到流言的伤害。宋庆龄说：“我的父母也不是那么愚昧、残酷！可怜的埃德，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制造这样的谎言，就为了给他的书制造轰动”，“但是他们从没有‘把我锁起来’！我离开家乘轮船，在一个同志和他女儿的陪同下去日本。那时是早

晨6点我父母还没醒。那才是事实！”⁽⁸⁾这里陪同宋庆龄去日本的我们都知道是孙中山的秘书朱卓文和他的女儿，英文名字叫“慕菲雅”。宋庆龄之所以要坚决对斯诺的荒谬说法加以驳斥，是因为她觉得如果不这样的话，这些以后就会成为历史流传下去，因此希望通过一切途径来纠正这样的谬误。

3. 关于蒋介石曾向她求婚的问题。

斯诺在书中写蒋介石在孙中山去世以后通过一个中间人来向宋庆龄求婚。

“She thought it was politics, not love, and declined. (她认为这是政治，不是爱情，拒绝了)”

关于这一点，《宋家王朝》是这样写的：“孙中山逝世后，蒋迫不及待地想以某种方式同圣洁的孙博士以及同宋家的威望和财力建立关系”，“蒋派了一个中国传统媒人——显然是张静江——向失去丈夫的宋庆龄提出了一个求婚的建议”⁽⁹⁾，“宋庆龄在同斯诺的一次谈话中追述了蒋的求婚建议。斯诺简要地记述如下：‘在孙博士1925年去世后，蒋通过一个中国媒人向她求婚。她认为这是政治，不是爱情，于是断然拒绝’。”在1984年中文版的《复始之旅》中，笔者没有找到这样的对话，可能是新的版本中删掉了这一部分内容。

宋庆龄对此非常恼火，认为斯诺没有尊重事实，这么写的主要目的就是激起人们对这本书的兴趣。她说：

“as if it was ‘love’, I’d have accepted him! What a dastardly comment against me!”⁽¹⁰⁾

宋庆龄的这句话，译为“好像如果是‘爱情’的话，我就会接受他的求婚一样！这是对我多么卑鄙的论断啊！”这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蒋介石没有向宋庆龄求过

婚，所以也无所谓接受不接受；另一种理解是蒋介石托人向宋庆龄求过婚，她拒绝了，但拒绝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蒋求婚的目的不纯。从宋庆龄对蒋介石一贯的态度来看，宋庆龄的这句话中，更多要表达的意思是：

“即使他是因为爱情而向我求婚，我也不会接受。”宋庆龄曾说过，自从认识孙博士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忠实于他，在孙中山去世之后，依然忠实于他。在宋庆龄漫长的一生中，对她个人的含沙射影的攻击被一再用来作为政治武器。因此，斯诺这样的描述，宋庆龄断然不能接受。

4. 关于孙中山是否希望举行基督教仪式的葬礼问题。

斯诺在书中以对话形式写宋庆龄说“举行基督教葬礼是孙中山的愿望”⁽¹¹⁾。宋庆龄对此断然否认。宋庆龄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这不是事实。他在信仰方面是indifferent。其实是孔祥熙坚持这一点，因为他是葬礼的‘主持人’。他还跟我商量过孙博士喜欢什么样的圣歌，尽管这不是我的意思。”孙中山究竟是不是基督徒，宋庆龄最有发言权。这里，宋庆龄明确说孙中山在信仰方面是indifferent，也就是说是无神论的。⁽¹²⁾

关于孙中山的信仰和葬礼问题，早在1966年4月13日，宋庆龄写给爱泼斯坦一封信中就写道：孙中山“从来不信什么上帝，他也不相信传教士（他们不是‘伪善者’就是‘受了误导’）”，“曾经有过一种谣传，说孙中山在弥留时要求把他葬在一处基督教公墓并由基督教会主持葬礼。这完全是假的。孔祥熙和孙科听了许多朋友的话，曾坚持要在协和医院小教堂举行一次基督教追思礼拜，藉以证明孙中山不是一个布尔什维

克。”可见，当时在协和医院教堂里做的是礼拜，并没有行宗教葬礼。据宋庆龄1976年4月给爱泼斯坦的一封信：“由于家庭中成员的坚持，确实是在医院教堂里举行了一次礼拜，但其他的更大范围的悼念都是非宗教性的。”⁽¹³⁾因此，斯诺书中的叙述不符合事实，显然宋庆龄会有不同意见。

5. 关于宋子文为她筹划一小笔年金的问题。

斯诺在书中说“蒋介石和共产党破裂后，宋子文动摇了。尔后支持了蒋介石，但他依然是宋庆龄在宋家的一位忠实的朋友。他为她策划了一小笔年金，偶尔也在政治上帮助她”。⁽¹⁴⁾这一点也不是事实。其实是斯诺自己认为宋子文设法给了她一小笔钱为生活之用。事实是孙中山死后，国民党知道他没留下分文，送了10000元（广东币）给她做生活之用，后来还给了廖仲恺的遗孀何香凝同样一笔钱。“子文从来没有提出要给我钱，因为他知道我不会收他的或是我家任何一个成员的钱。我弟弟尊重我，尊重我的意愿”。宋庆龄在欧洲的时候，孙科认为宋庆龄来自国民党方面的收入不够她在国外生活的，曾经给她一张支票。宋庆龄立刻把支票还给了他，说她会和那里所有的学生一样过着简朴的生活。当时宋庆龄在柏林图书馆读书，“住的是从房东那里租的有家具的房间，每天只花50芬尼（50分）在一家中餐馆吃一餐，所有的食物也就是面包、茶和果酱，跟其他在那里的学生一样。邓演达、叶挺、章克（雷娜·普罗梅的秘书）等同志还有几个四川的女孩经常聚在一起讨论政治问题。”⁽¹⁵⁾

6. 关于所谓的她对大姐宋霭龄的冒犯之辞。

斯诺在书中说宋庆龄用极轻蔑的又钦佩的口吻对他讲了宋霭龄在金钱交易上的手腕，是这么说的“霭龄聪明极了，她从不冒险，只有当她预先从财政部的同伙那里得到政府财政政策变动的情报后，她才决定买进或卖出。”⁽¹⁶⁾宋庆龄对于斯诺这样的说法也很有意见，认为斯诺想象的东西太多了。首先，是斯诺自己告诉她说宋霭龄是怎么利用告诉人们何时买入，何时卖出股票的内幕消息获得的金融交易的知识，通过投机生意赚钱的！宋庆龄称自己一直讨厌数学，完全不懂金融方面的事！都是斯诺告诉她的！第二，她从来没有像斯诺说的那样叫大姐的名字，“姐姐”是她从儿时起到大姐的唯一称谓。

7.关于孙中山建议列强占领中国的问题。

斯诺在书中说孙中山“建议英、法、美三国占领中国五年，消灭军阀，跟国民党合作，建立一个公正的政府，帮助中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使人民做好民主选举的准备。”⁽¹⁷⁾作为孙中山思想的继承和捍卫者，宋庆龄明确地说：“孙博士从没提议让外国列强占领中国，而是主张帮助国家的发展。”⁽¹⁸⁾

斯诺书中的这些谬误，宋庆龄曾经试图通过各种办法加以纠正。宋庆龄在给友人的信中多次提到斯诺夫妇拜访她的时候，她曾经谴责斯诺书中的这些错误，斯诺也承诺做出修改，并将写信给出版商，删除新版中的不实之辞，当时路易·艾黎和马海德都在场，可以做证。

宋庆龄斯诺夫妇久别后的重逢是在1970年，也是斯诺夫妇最后一次访华，宋庆龄几次邀请斯诺夫妇到家里喝茶或吃饭，艾黎、

马海德等都参加了。1970年9月27日晚，在北京寓所宴请斯诺夫妇，并邀请路易·艾黎、马海德夫妇等参加。⁽¹⁹⁾根据斯诺那些未经编辑加工的笔记，1970年10月3日，宋庆龄请他们夫妇去喝茶，还有马海德和路易·艾黎。10月11日“同孙夫人、艾黎、马海德夫妇共进晚餐(还有孙夫人的保健医生)……”斯诺在笔记同一页上附注道：北京的来信“最近批评我在《复始之旅》一书中的错误——很有道理”。这里的北京来信可能来自路易·艾黎，据爱泼斯坦著《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宋庆龄曾指出《复始之旅》中的一些事实错误和一些她不能同意的看法，并嘱路易·艾黎转告斯诺。

1970年底，斯诺夫妇离开中国。但是，让宋庆龄失望的是，不知是因为斯诺正受癌症的折磨还是出于别的什么原因，斯诺没能履行他对宋庆龄的承诺，他什么都没做！没有公开的道歉！没有改动！宋庆龄对此非常恼火。宋庆龄认为斯诺书中的这个黑点必须彻底清除，即使是要对出版商采取法律手段也在所不惜，因为他写的东西被很多人奉为“事实真理”。1972年2月，斯诺因为癌症去世。虽然对这本书有诸多不满，但是这并不影响宋庆龄与斯诺的友谊，宋庆龄向斯诺夫人发去了唁电，并参加斯诺的追悼仪式，还撰写了《纪念埃德加斯诺》的文章，深切怀念这位中国人民的忠诚朋友，对斯诺在加强中美友好方面的突出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1975年，宋庆龄通过好友邓文钊的儿子邓广殷⁽²⁰⁾，与洛伊斯·斯诺⁽²¹⁾接洽，要求纠正书中的错误描写。还就此事写信给廖承志请他咨询外交部新闻司正式处理此事。据邓

广殷老先生回忆，这其中的过程极为复杂，最终也没有能够将这些内容纠正过来，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注释：

- (1)《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470页
- (2)海伦·福斯特·斯诺：美国新闻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的前妻。1931年来华。曾任上海《密勒氏评论报》通讯员兼评论员。1937年访问延安。1938年与埃德加·斯诺、路易·艾黎一起创办中国工业合作社。1941年至1949年为美国纽约《星期六文学评论》书评作家。1972年后数度访问中国。
- (3)《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461页
- (4)1960年8月16日斯诺致宋庆龄信，馆藏文物
- (5)宋久、柯楠、客雄译：《复始之旅》，1984年8月出版，第108页
- (6)宋庆龄1975年3月11日致邓广殷信，宋庆龄1980年12月12日邓广殷信，馆藏复制件
- (7)宋久、柯楠、客雄译：《复始之旅》，1984年8月出版，第104页
- (8)宋庆龄1975年8月13日致邓广殷信，馆藏复制件
- (9)Sterling Seagrave: *The Soong Dynasty*,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85年出版，第214页
- (10)宋庆龄1975年致邓广殷信，馆藏复制件
- (11)宋久、柯楠、客雄译：《复始之旅》，1984年8月出版，第109页
- (12)宋庆龄1975年致邓广殷信，馆藏复制件
- (13)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人民出版社，2004

年3月出版，第153页

(14)宋久、柯楠、客雄译：《复始之旅》，1984年8月出版，第105页

(15)宋庆龄1975年致邓广殷信，馆藏复制件

(16)宋久、柯楠、客雄译：《复始之旅》，1984年8月出版，第106页

(17)宋久、柯楠、客雄译：《复始之旅》，1984年8月出版，第110页

(18)1975年宋庆龄致邓广殷信，馆藏复制件

(19)盛永华主编：《宋庆龄年谱》，2006年8月出版，第1735页

(20)邓广殷：香港崇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前董事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福利会港澳理事，上海宋庆龄基金会理事，香港著名爱国进步人士。父亲邓文钊是1938年与宋庆龄在香港共同创办保盟的领导人之一，曾倾其家产支持宋庆龄的抗日救亡活动。邓广殷深受父亲影响，对宋庆龄无比敬仰。建国后，邓广殷源源不断地从香港为宋庆龄提供所需生活用品、办公用品和外文期刊等物资。宋庆龄临终时，邓广殷去北京侍候在侧，宋庆龄留下遗嘱将自己的全部书籍赠送给邓广殷，而他将全部书籍无偿捐赠给国家。今年邓广殷先生将其珍藏的1970年—1980年宋庆龄写给他私人信件影印集捐赠我馆，这批书信全部由英文亲笔书写，真实地反映了宋庆龄晚年时期的思想和生活，是研究和考证宋庆龄晚年时期思想活动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本文中所参考的部分史料亦来源于此。

(21)洛伊斯·斯诺：美国女演员，埃德加·斯诺的第二任妻子。婚后生有一对儿女克里斯托弗和茜安·斯诺。

谈谈名人故居的建档工作

撰文/麦灵芝

作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名人故居，是国家历史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名人故居档案有利于故居文物价值的保存和利用，是文物保护工作中一项不可忽视的重要保护手段和最有效的途径之一。

一、建档的意义

名人故居需要保护的，决非只是一座可以使用的建筑物。名人故居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是其价值所在。如何保护故居，使之延年益寿是故居文物工作的主要内容。然而一提到名人故居的保护工作，往往会认为就是保养维修，只要故居维修保养工作到位，故居的保护工作就算完成了。对故居保护工作认识上的局限，导致了对故居建档工作的忽视。事实上，建立并完善记录档案是故居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环节，是保护故居的专门手段。忽视与故居密切相关的记录档案，不仅使故居图有躯壳，没有可信的历史内容，造成文物价值的降低，也会使我们的文物保护工作失去它的社会意义。

名人故居的遗址保护原则是要保持它的原真性，只有保持其历史的本来面目才能体现出故居的历史、文化价值，也才具有保护的真正意义。名人故居存留至今，已经岁月沧桑，而今又成为人们追忆历史的场所，旅游的景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各种自然与非自然因素的影响不可避免地会在故居本身留下痕迹，造成这样那样的损毁。要修复这些被损坏的遗迹，恢复并保持故居的原

貌，必须掌握故居原始的详细情况。故居档案是唯一能够准确反映故居全面情况的详细记录，成为修复和复原故居的依据。如果没有记录档案，单凭回忆很难做到复原工作的准确与完整的，就算修复了，也很难具有说服力。故居的历史价值和可信度也会因此受到质疑。所以建立故居记录档案是必须重视的一项重要的保护性科研工作，是故居文物保护工作中一个最基础、最重要的环节。故居档案不仅会在修复方面成为重要的依据，而且还会在学术研究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建立记录档案是《文物保护法》对包括名人故居在内的不可移动文物做出的明确规定，同时也是长期以来文物工作者在保护工作中得出的经验，所以说建档工作是既有法律根据，又是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保护方法，更是文物保护工作者不可忽略的职责。

二、建档的要求

档案资料的完整和系统是档案的价值所在。对准备归档的资料应按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记录档案工作规范》中的归档范围进行鉴定和挑选，确保具有保存价值的资料及时归入档案。归档的每一份资料都要进行核对，纠正错误与偏差，对模糊不清之地方要及时澄清，从而使故居档案资料达到真实可靠，保证档案的质量。虽然核对工作繁琐，有时甚至需要多次反复，但这是为了把好档案的质量关，不能有丝毫马虎，否则就有可能影响整个档案的准确性，给今后的档

案利用埋下隐患。

不断完善档案资料应该成为我们建档工作的着力点，使档案系统化则体现出整理工作的作用。在严格遵循建档规范的基础上，应结合故居本身的特点，完善档案资料，提升资料的质量。以图纸卷为例，作为名人故居，保持故居的环境和室内的原状陈列与保持故居的建筑同样重要。某种程度上，故居建筑内的陈设更能反映历史人物的生活痕迹，更能体现历史人物的真实性，传达更完整的历史信息。所以“故居室内原状陈列平面图”、“故居古树名木分布平面图”等也应收入档案中，可为今后故居长期保持其历史风貌，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我们收集的各类档案，按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记录档案工作规范》建档要求，必须分类立卷，而事实上所有我们所收集的档案都是围绕一个主体，档案之间应该有内在的联系。因此我们在建档过程中，不仅做好档案资料的分类，使之条理化，同时也要注意做好档案之间的对应关系，使之系统起来，最终体现故居建档的完整性。要熟悉已收集的每份资料内容，尽可能多地了解和掌握资料形成的过程，便于立卷时保持档案之间的联系以及组成档案体系的逻辑性。譬如，反映故居建筑现状的照片，可先按照测绘图纸，拟好拍摄提纲，然后有针对性地进行拍摄。建筑的各个内立面、外立面、重要节点和门窗详图等都要有与之对应的照片，然后在每张照片的说明上注明对应图纸的图号，以方便查阅时对照。照片与图纸相互说明、相互补充，使得图纸更加直观，也使照片反映的事物更加精确。把不同卷的档案做一些对应关联，能够使档案更加系统化，不光能体现档案整理工作的作用，更能

提升档案本身的使用价值。使故居档案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完整地反映出故居文物工作的每一方面的活动情况，更能便于对故居档案资料的查考利用。

三、档案的管理

做好故居档案的管理工作，保证故居记录档案的完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实际工作中，由于管理不集中，档案资料分散而造成文物保护、管理工作的失误，并不鲜见。所以，我们在从事故居文物工作时应该具备文物的档案意识。首先应建立统一的档案管理和利用办法。集中统一管理是档案工作的基本原则，维护档案的完整与安全，与我们的保护工作息息相关。我们在从事故居调查、故居修缮保护、陈列展览等各项工作时都会形成各种各样的文字记录、报告、方案、文件、图纸、照片等原始资料，而这些资料对于故居的科学管理、妥善保护，深入研究以及合理利用，都是极其宝贵的重要依据。譬如，我们在维修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图纸、方案等不仅仅在维修工程中使用，还是今后的历史档案资料，是各项维修留下的历史信息 and 重要的证据，也是今后故居修复辨识工作的重要参考，所以都应认真收集、整理并归档。如果不把记录这些业务活动成果的档案建立起来，那么随着时间的流失，既反映不出历年来文物业务工作的全面情况和真实、完整的历史面貌，同时也失去了提高文物保护与学术研究的历史借鉴。因此，必须让每个从事故居文物工作的人都能认识到，把保存在各个部门当中的与故居文物工作有关的文字、照相、音带、光盘等归入故居记录档案，尽可能避免因档案的缺失而造成文物工作的不必要损失，也是贯彻《文物

故居陈列文物的除尘

撰文/方国富

上海宋庆龄故居的原状陈列是依照宋庆龄生前的生活原样布置的，基本上都是原物。长期固定展示，而且是开放性陈列，参观者可以进入每个房间参观。由于参观人流进进出出，室内空气中污染物含量必然会随之增加，加之各种文物基本没有橱柜等保护设施，所以文物蒙尘现象比较突出。

灰尘的种类、成分极其复杂，化学组成因地而异。由于灰尘表面积很大，物理吸附性能很强，具有复杂化学成分的灰尘其化学活性也会得到极大的加强。同时灰尘又是多

种空气污染物的载体和催化剂，微生物孢子及霉菌等很容易附着在灰尘上而被带入室内。而尘埃对文物具有潜在的威胁，它会伴随微生物与虫菌，一旦保存环境潮湿且通风差，极可能造成虫霉害的蔓延，若加上与空气污染物长久的结合，进而促使文物产生质变而劣化。因此，灰尘对文物既有物理损伤，也有化学破坏，还有生物破坏，都会在不知不觉中加剧文物材质的劣化和表面形貌的改变。因此日常养护的除尘工作就成为保护这些陈列文物的重要手段。文物清洁的目

保护法》、《档案法》的具体表现。

四、档案数字化

计算机管理已成为现代管理的必要手段，故居记录档案管理也要走数字化管理之路，建立故居记录档案数据库，实现故居记录档案的数字化管理，是故居档案工作的必由之路。历史档案资料大多是纸质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保存的难度会越来越大，这会大大影响以后的档案有效使用，再加上档案内容的不断增加，档案利用的不断扩大，档案的管理工作必将越来越繁杂和困难，所以建立档案数据库，实现档案的数字化管理，是故居档案工作的必由之路。建立档案数据库，把各种文本和照片资料等用电子扫描的方式进行存储，对各个时期的历史图纸采用CAD制图软件，进行了数字化处理，存

入电脑。声音资料也进行数字化外理，刻入光盘保存。各类档案资料数字化后，可以解决档案内容长期保存的后顾之忧，也方便了档案的查询和利用，有了档案资料数据库，还可以使分散在各卷的档案可随时按查找要求汇总，这样，一来可以解决档案在归档时要求分门别类，分卷归档，利用时要求内容完整的矛盾；二来可以使每卷的续补内容与立卷时保持连贯和完整；同时还可大大提高档案管理工作的效率，使档案的检索和查阅更为方便快捷。各类档案资料数字化后，解决了档案内容长期保存的问题，也方便了档案的查询和利用，是故居档案工作中既利于当代，又泽被后人的好方法。

总之，建立好故居记录档案并把档案妥善保护和有效管理，是保证故居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永不失色的最有较途径。

的就是要稳定文物的状况，抑制文物劣化的速度。

故居原状陈列的文物由于器物种类多，质地各异，在清洁处理时所采取的方式也各有不同。因此在进行文物清洁工作之前，均要根据文物特性，选用有效清除污物且又不危害文物的方法，并建立相应的文物清洁工作流程。

陈列文物的日常清洁主要是除去器物上的污垢、尘埃等。根据故居陈列文物的不同质地和种类，清洁处理一般有以下几种方式。

1. 水洗——瓷器、玻璃、玉器这类一般质地坚实，不怕水的器物、特别是有孔隙的镂空部位，容易藏污纳垢的缝隙，应用软布浸湿后轻轻擦除。有必要是也可以用清水洗涤，如果用了清洗剂处理，一定要用清水再漂洗，除去清洁剂本身的酸、碱等成分对器物的影响。水洗的方法会增大文物的湿度，影响文物的保存环境，因此经过水洗的文物一定要放置在阴凉处，待器身水分蒸发、吹干后再行陈列。

2. 干擦——银器、铜器、铁器等金属类文物以及家具、漆器等，这类器物易氧化，怕潮。所以可用小刷或松软的布轻轻擦抹即可。目前比较好的清洁用布有仿木浆海绵和蜜胺海绵。仿木浆海绵的多空性能够把灰尘吸附到孔内，与灰尘的结合度强。手感柔软，在擦拭的过程中自身不会划伤物体表面。它很适合用于家具、金属器物等的表面除尘。蜜胺海绵的用途广泛。干燥时使用，可清除物体表面极细小的灰尘，吸附力极强，浸湿后，它可以清除顽垢，特别是清除金属表面的油污效果极好。此外，我们还可借用一些生活用品作为手工除尘的一些小

工具，譬如：粘尘胶带纸、面团、口香糖等等。

3. 机械——地毯、沙发、床，故居的室内大都铺有地毯，地毯的吸附性很强，虽然参观者进入故居都穿上了鞋套，但各种尘埃、异物仍不可避免被带入展室，掉在地毯上。如果不及时把这些东西清除，地毯就会成为藏污纳垢之处，一旦保存环境潮湿且通风差的条件下，极可能造成虫霉害的蔓延。对此我们应该经常用吸尘器吸尘，吸尘器最好是备有各种形状的吸风头、可根据需要调整吸风量的那种，会有更好的效果。

4. 风晾——床褥、被子、靠垫、书籍等，对于这类不宜水洗或干擦的纸质物品和部分水洗可能褪色、结构受损的织物，可以选择风晾方法，将其表面的粉尘和湿气吹去。在室外风晾时应注意天气变化。要避免较强风力，随时掌握温湿度变化。同时还要避免在梧桐落铃季节进行风晾，以防止落铃沾污文物。

陈列文物的除尘不仅要根据文物不同质地、主要蒙尘部位采取相应的措施，还有赖于整个陈列环境的改善，减少室内外空气的自由流通，采取各种密封措施，尽量保证室内空气的稳定和清洁，根据情况对室内空气采取过滤和净化措施，消除污染成分是根本的方法。故居目前使用的是内循环的中央空调系统，长时间使用空调不开窗虽然可以减少灰尘的进入，但室内空气质量就会很差。因此有条件的话，可以把内循环空调系统改成外循环空调系统，还可以加装专门的室内空气净化装置，这些设备都会对故居陈列环境的改善发挥良好的作用，陈列文物蒙尘现象也会大大减少。

故居古树名木的养护

撰文/周美瑛



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是上海市花园单位，绿化面积达2700平方米，其中古树名木34棵，4棵（1棵山茶、1棵香樟、2棵广玉兰）属一级保护，其余30棵香樟属二级保护。这些古树环绕在故居主楼四周，终年枝繁叶茂，浓荫匝地，将整个故居掩映在葱翠之中。宋庆龄在此居住期间，对古树名木十分珍爱，一直悉心照料，亲自养护。故居庭院内的古树名木既是重要的自然资源，也是宝贵的历史文化财富，被誉为“活”的文物。在古树生活的过程中，会出现腐烂等一些自然的生理现象，为了保护这些古树，有时必须进行人工干预。

一、合理修剪

故居古树经过多年生长，古树的树冠稠密高大，形成了单体的“高脚脚杯”状，加之通风条件差，光照度达不到要求，妨碍了古树名木的正常生长，同时，高大的树冠对文物建筑，灌木草坪生长和周边架空线路以及居民区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和隐患。2006年宋庆龄故居进行了全面修缮，为了给古树名木创造一个适宜的生长环境，我馆委托徐园绿化养护有限公司制定了古树名木保护方案，经过专家论证后，2006年3月对故居院内的古树名木进行了整枝修剪和缩枝。

对古树名木的修剪应以促进树势正常生

长和复壮为原则，对体现古树自然风貌的无危险枯枝应涂防腐剂后予以保留。修剪时应搭脚手架或使用高枝油锯，须注意安全。故居的古树名木都为常绿树木，适宜在换新叶之前修剪。在树木生长期应及时修剪过多的萌蘖枝、过密枝、严重病虫枝等。休眠期修剪主要根据树木生态习性进行修剪，如下垂枝、重叠枝；如果树冠明显不圆整、重心不稳定的，应适当短截树冠外围过长枝。对常绿树局部密集的枝条适当抽稀；对主干中有大空洞或生长于风口处的古树名木，应适当抽稀树冠，同时清理古树上的病枝。修剪时切口应光滑平整，不能撕裂，便于皮层加快愈合。短截切口必须靠节，剪、锯口应在剪口芽的反侧呈适度倾斜；剪锯切口必须保持平整，确保切口面不积水。对直径大于2cm的剪、锯口一般要用硫酸铜消毒处理，以防治寄生虫或病菌侵袭伤口，并涂抹伤口愈合剂，如波尔多液护创剂或羊毛脂。

二、防腐和补洞

古树的防腐和补洞技术是古树名木保护的一项重要措施。通过防腐、补洞的处理，可促进古树伤口愈合，改善树貌，延长古树寿命。古树蜕皮的表现方式有树皮隆起、脱落、其形状不规则，严重的成环割状。这些蜕皮产生的原因有病虫害，如天牛、白蚁、

真菌等引起的腐皮脱落。害虫在韧皮部蚕食，导致该块韧皮部与整体韧皮部分离，失去水分和养分的供给，从而失去生命活力，最终死亡脱落形成蜕皮。衰老和环境条件恶劣等因素也会引起蜕皮。为了防止木质部继续腐烂，促进伤口愈合，必须对蜕皮进行处理。根据树木的生理特性，即形成层向外形成韧皮部的原理，对已受到侵蚀或腐烂的裸露木质部，要将已腐烂或已变色部分彻底清除，对于未受侵蚀或未腐烂的裸露木质部表面清洁即可。而后进行防虫消毒，除虫药剂用灭蚊磷原液，用针筒或毛笔涂擦。除虫药用后一天方可用消毒剂，消毒剂主要用硫酸铜，与水的比例为1:30~50，用小型瓶式喷雾剂即可，还可用高锰酸钾消毒。完成清腐、除虫、消毒后，要进行防腐剂涂抹，注意裸露的木质部需全部涂抹，不可遗漏，涂抹3~4次后，每次需干透后才可涂第二次。目前使用较多的防腐剂是桐油，其它如梳理剂、水柏油、石蜡等，其效果均各有特点。

韧皮部或木质部受创伤后，如未及时进行防腐处理，当受到雨水侵蚀引起真菌类危害，久而久之就会形成树洞。树洞内清腐可采用合适的工具，如榔头、刮刀、凿子、刷子、铲刀等对腐烂的木质部进行全部清除，要求尽可能地将树洞内所有腐烂和已变色的木质部清除，至硬木即可，注意不要伤及健康的木质部。树洞内的除虫和消毒方法同处理蜕皮。完成上述步骤后就可用水泥混凝土对树洞进行填充了。水泥混凝土价格适中，使用方便，填充密实不留空隙，在愈合过程中，木质部不受雨水侵蚀，蛀干性害虫也较难再次危害。树洞清腐，除虫彻底后，一般来讲填充物可与树体紧密对接。如果在水泥混凝土中加些胶水，效果会更好。最后需将

洞口树皮进行刮削至鲜活部位，愈合状的洞口，不宜多作刮削。根据树洞的着生位置及程度有着不同的处理方法，可分为：

1. 朝天洞：洞口朝上或洞口与主干的夹角大于120度。此时修补面不许低于周边树皮、中间略高、注意修补面不能积水。

2. 通干洞（对穿洞）：有两个以上洞口，洞内木质部腐烂相通，只剩下韧皮部及少量木质部。这种洞一般只作防腐处理，尽可能做得彻底，树洞内时有不定根，保护好不定根，并合理设置好导流管，使流水更顺畅的排出。

3. 侧洞：洞口面与地面基本垂直，多见于主干上。不腐烂、不积水的侧洞通常只进行防腐。

4. 夹缝洞：树洞的位置处于主干或分支的分叉点。有引流不畅的夹缝洞都需要补。

5. 落地洞：树洞靠近地面近根部。非对穿的落地洞要补，对穿形式的落地洞一般不补，只作防腐处理。落地洞的处理以不伤害根系为原则。

三、虫害防治

由于环境阴湿，古树生长过密，通风透光条件差，古树易受病虫害侵害，由于先期害虫等危害，消耗水分和养分，易使树势衰弱。古树一旦衰弱后，蛀干害虫如小蠹虫等次期害虫乘虚而入，破坏树木的输导系统，容易造成树木死亡。因此，应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推广和采用以低毒无公害的生物农药为主，充分利用生物防治方法，积极保护和利用鸟类、昆虫等天敌防治虫害，减少环境污染等措施，加强有害生物的检测工作，对在巡视中发现的有害生物应做好调查记录。

白蚁是危害故居广玉兰、香樟等古树健康的一大因素，应按季节要求，做好挖坑、投饵、杀虫等各项工作，施药时间最好为5~9月份。对馆内各类树木逐棵检查白蚁的出入路径，认真观察蚁路，发现后及时下药诱杀，尽可能做到发现一窝、扑灭一窝。在白蚁飞出离巢季节，在花园设置诱虫灭光灯，诱杀白蚁，尽可能控制飞出范围。及时清理树群下的各类垃圾，如枯枝落叶或因清理树身带来的虫卵和垃圾，减少虫害的孳生，枝叶修剪时及时做好切口的处理，用药消毒和封口。对樟树下的乔木，疏枝控高，抽稀植物和种植密度，改善通风透光条件，加强对病虫害的监控工作，仔细分析虫情，对症下药，做到早发现、早治理。对已进行清理的古树施涂除虫剂、消毒保护剂。

四、土壤养护

在对古树名木所处土壤进行养护前，应规划清理表土层种植的各类地表植物，并对古树周围的地表进行表土翻松。在生长季节进行多次中耕松土，冬季进行深翻，施有机肥料，以改善土壤的结构及透气性。

古树名木长期生长，若没有外来补充，土地的肥力及其理化性能会大为减退，适量施些有机肥，可保证古树正常生长的需要。由于古树年老，生长势弱，根系吸收能力差，故施肥时不能施大肥、浓肥，应采取“薄肥勤施”的原则。同时应开设盲沟排除积水，以保持土壤中有适当的空气含量。施肥应根据古树名木树种、树龄、生长势和土壤等条件而定。施肥的距离一般在树冠垂直投影内侧的地表做根外追肥，施肥的方式可采用穴施条施或根外追肥等方法。施肥前先探根，再在吸收跟附近均匀挖3~4条长宽

深为50×25×30（cm）的辐射状沟或直径5~10cm、深30~50cm、穴距60~80cm的穴洞；施肥位置应每年轮换。当古树名木根部土壤出现空洞时，应及时填充土壤；当根部须根裸露时，应及时覆土，覆土厚度应为3~5cm。填充或覆盖用土应选用富含有机质的疏松土壤。古树名木保护区内原先采用硬质铺装材料的，应改用透气铺装材料。

五、立牌保护和档案管理

古树名木的保护是一个整体的概念，需对古树名木所在地原有的生态环境，并明确划出保护范围，设置保护标志，制定保护措施。故居原有的古树名木保护牌陈旧且不符合要求，与故居的环境不相称，后经上级部门同意，统一调换成金属说明牌，立于古树名木前，庄重美观。

古树名木必须设立专项档案，专树专管。故居的34棵古树名木都建立了较为全面的档案，其中包含古树的历史背景、树木的照片、树龄、胸围、根围、树冠、树高、生长情况，还备有方位图。全面系统地说明古树名木的资源分布和生长状况，结合档案记录对古树的生态环境、生长发育状况和保护现状进行动态监测和跟踪管理有着很大帮助，通过后期的物候观测、年生长量测定、病虫害发生及防治措施、土壤理化分析等有助于更好地保护古树名木。

故居古树名木经过多年的养护，现在既为故居文物的一部分，又是庭院环境独特的一景。当游客徜徉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中，心情也慢慢变得恬静下来，随着耳边响起讲解员清脆悦耳的声音，宋庆龄的故事便潜移默化地沉寂心底。蓝天、古树、故居和人融成一体，一起欢迎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

个人的历史

选译

撰文/郑培燕

8

1927年有好几个月，差不多有半年多的时间，汉口集中了、象征着，也支撑着在世界进行一场革命的希望。欧洲、亚洲和美洲都派来了代表团，想亲自看一下是什么使得汉口的成功能够继续下去，这使得饱受挫折的一代共产党人感到惊奇和欢欣鼓舞。1917年的伟大期盼终成泡影。欧洲的社会革命失败了，部分国家（如德国）是因为上层的压制力量，部分国家（如澳大利亚）是因为社会主义领导人的背叛，部分国家（如匈牙利）是因为反动力量当中出现分崩离析。亚洲的革命，虽然在列宁1921年的伟大演说之后，一些有组织的共产主义分子对之寄予了最高的希望，也是要么未能实现，要么转化成了单纯的民族共和运动（如土耳其）。即使在俄国，想要掩藏共产党内部对立阵营生死攸关的斗争也是不可能的了：一方希望为世界革命而斗争，一方希望集中在现存的苏维埃国家将革命进一步推进。共产主义者不仅将汉口视为1917年以来革命取得的最显著成功，也是一个试验的实例：如果汉口的成功能够得到推广并能持久下去，国际（托洛茨基主义）倾向取得胜利就能够得到保证；但是如果汉口失败了，好战的世界革命主义

者也就失败了，甚至俄国的未来也将变得模糊渺茫。

你不可能来到汉口一个星期还意识不到这些。法国共产主义者、德国共产主义者、印度共产主义者、英国独立工党，以及无数共产国际的鼓吹者让这里有一种混合在一起的国际起义的味道。这些革命者中很多人不愿抛头露面，尽力掩藏他们的来往和行动，这一事实使得这种现象更具特殊意义。越过一家餐馆的台子，看到一个橡木雕刻的罗伊（Manabendra Nath Roy）的漂亮头像，那是共产主义国际远东地区领导人的头像，和雅克·德里奥特（Jacques Doriot）（就是曾试图将我的一篇散文引入下院会议记录中而引发争吵的那个德里奥特）那乱蓬蓬的脑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些职责不明的俄国人出现了，又消失了。他们中有一个，说他曾经受雇于共产国际，但可能是受雇于一个非常不同的组织，他在大约这个时候出版了一些描绘中国的革命活动者生活的“内幕”和“坦白”，就像奥尔锥（Baroness Orczy）的小说一样充满了冒险，这使得通商口岸都活动起来了。当我看到这些活动者的时候，他们并不是在冒险，而是在讲话——讲话、讲话、讲话，好像看到了眼前有能够操纵历史材料时只有理论的共产主

义者才能说话。他们大部份的谈话留给人的印象就像是作曲家的交谈——理论太多，音乐不够。要找音乐，要找革命本身，我要么得去找中国人，要么去找鲍罗廷。

没有人会因为看了汉口几眼就假设那里的政府及政府支持的运动都是赤色的而受到谴责。那里众多的外国革命者就好像是啤酒的泡沫一样，但他们引人注目。其他能看到的现象有：频繁的罢工、群众集会和示威；工人区（被称为新世界，一个俄国或意大利风格的中心），学生或工团主义者的行为，给人一种错觉，即认为这是一场高度组织的社会革命运动，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夺取生产机器，宣称无产阶级专政。

但是它并没有发生。一个月又一个月过去了，它还是没发生。在遥远的莫斯科，托洛茨基（Trotsky）和拉迪克（Radek）以及其他，渐渐已经失去耐心，在那里写啊说啊，好像中国苏维埃已经存在，只是由于鲍罗廷和国民党的鼠目寸光而不能坚持自己的权利。在英格兰、法国和美国，存在一种截然相反的谬论，中国共产主义政府应该已经在俄国的支持下由鲍罗廷和国民党创立了。欧洲新闻界提及“汉口的共产主义政府”时非常严肃，似乎它已经被所有政党和国家承认了。即使是现在，也就是七年之后，偶尔看到“汉口共产主义试验”也不足为奇，尽管汉口经验的最大特点是它根本就不是共产主义的。

去假设在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或者即使是共产主义实验，私人资本将自由地维护和加强雇佣阶级对工人的统治是不可能的。而且这也是在汉口整个所谓的“共产主义”试验过程中确实发生的情况。私人资本自由地流动到它所热衷的地方，把罢工者隔绝在其

之外，自由地移民、变换地点，重新投资。在那些日子里通过购买折旧资产可以获取小额的财富，那些厌倦了劳资纠纷的企业家只有关掉他们的商业机构而把钱投入到纽约股票市场。股票、信用证交易交换在汉口一直都是自由的——也不得不这样，这一点后面会讲到。生产过程因罢工受到阻碍，这是真的，劳工委员会确实提出过在工业控制方面占一定份额的要求，但那都是只有在资本主义国家才能发生的事情。而让企业家们觉得不祥的，也在全世界提高了“共产主义”呼声的是这样的事实：即它是在共产主义者的活动下，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支持下，伴随着各种革命宣传的呼声而发生的。

如果欧洲资本主义新闻界认为汉口是“一次共产主义试验，”共产主义者他们自己可不这么认为。他们希望它成为一次共产主义试验，因为它不是，他们气急败坏，恼怒不已，想尽一切办法让它能朝着理想的方向推进，最后，当一切似乎都成无用功后，就四处找别人来谴责。就像欧洲和美国的报章上所说的那样，对于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他们很自然地归罪于最显著的人物；鲍罗廷静静地成为了中国革命的公认的替罪羊。欧洲人将革命成功归功于他，而俄国人将革命失败归咎于他，中国人将两派的分裂归结于他。在六月初，他在中国不仅是最出名的，也是被骂的最多的人，共产主义国际的正式代表们对他的热爱也就跟标准油公司的代表们差不多。

“现在只有一件事要做，”共产主义国际的人会说，“这件事四月份就应该做了。那就是：宣布苏维埃政权！”

中国没有苏维埃政权的事实对于从莫斯科来的老资格共产国际代表来说没有任何影

响。

“现在只有一件事情要做，”标准油公司的代表会说，“那就是停止这些罢工，让蒋介石来摆平它们。这件事早就应该做了。”

“停止罢工，让蒋介石来摆平它们”将意味着放弃革命对于标准油的人来说一点都不相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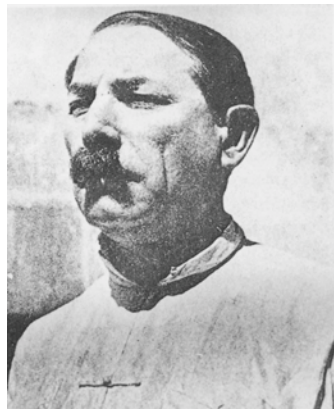
处于那些理论上的共产主义者不切实际的要求和外国资本的反动要求之间，鲍罗廷一定会成为替罪羊，不是因为他试图保持中间的路线或是相信妥协，而是因为形势不允许进行大胆的共产主义试验。起先，就如我大多数的记者同事们一样，我也认为汉口是赤色的；之后，看到无休止的罢工没有任何结果，资本依旧牢牢地受到保护，宣称无产阶级专政很明显是不可能实现的，我就觉得汉口不是赤色的，革命的特点就是一场没有任何颠覆性目的的左派民族革命。必须熟知革命者们的情绪和脾气，以及他们当时的文学和具体外化的表现（如演讲、群众集会，党团决定）之后，才能揭示这样一个事实：即汉口代表了建立一个赤色中国的愿望，这一愿望由于强大的西方国家的联合而落空了（这些国家事实上而不是理论上用他们的军队和海军占领着中国，保护着所有外国银行的资本）。汉口尽可能地接近赤色，但是很快就达到了极限，以致任何彻底的共产主义者都不满意。换句话说，这场运动是客观的而非主观的列宁主义运动。

赤色愿望和赤色国家机器都有了。我将用一些不怎么有趣的细节来支持这些论述，但它们不需要这样的证明，因为事实是不容争论的。在四年里鲍罗廷将整个国民党左派（也就是激进派）改造成了一场社会革命运

动，中俄的革命活动者不知疲倦地在工人和农民当中活动。那么，为什么他在四月或五月踌躇不前，没有采取最后的步骤宣布“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这一共产主义的惯用公式呢？为什么，已经走了这么远，经受了这么多危险之后，他不夺取革命机器（国民党左派以及其中少数中国共产党）并用它来挑战世界呢？到处都有被激怒的共产主义者问这个问题，他们中大多数都在莫斯科，而结果证明每个国家共产党的命运都系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之上。这也是一个即使是最强烈的反革命阵营里常被问及的一个问题，我清楚地记得，一天晚上在汉口玩扑克游戏，当中停顿的时候，一个大资本家（美国人）转向我说道：“什么时候鲍罗廷打算一干到底啊？我希望他动作快点早点结束。”

所有这些人，共产主义者或是反革命，不管出于什么想法，从托洛茨基到洛克菲勒，再从洛克菲勒到托洛茨基，似乎都认为鲍罗廷能从中国革命中获得他所期望的结果，或至少造就出以汉口政府所代表的更进步的派别。那么鲍罗廷自己呢？

他没有这样的幻想。沉着、考虑细致周到，没有任何个人野心或是自我为中心的迹



鲍罗廷

象，他检查自己的问题就像那是他最喜爱的象棋游戏中的问题一样。他可以做某些事情，会产生某些结果；他可以做某些其它的事情，跟着产生其它某些结果；但还是有一大堆事情他根本一点也做不了。两件他无疑做不了的事情就是——托洛茨基他自己也没做成——第一，取消驻中国的美、英、日、法的海军；第二，从已经半觉醒的中国工人和农民当中快速产生灵活的、坚决的革命工具（无产阶级）。他比别的任何人都更清楚即使在最进步的工会政治教育进行到哪一步了，让那些刚刚才开始理解革命行动原理的人做出多大的牺牲才是可能的。至于海军！——他只有从窗子里往外看，江面被封锁，大炮对着岸上，他们的长官和士兵公开地夸耀他们渴望有个机会，正如他们说的，能用机关枪、步枪和刺刀来“清理局面”。

这些就是鲍罗廷在中国的日子里所面对的现实——面对这些他已经过了三年。托洛茨基，俄国革命最卓越的专家，作为英雄和历史学家，离中国是很遥远的；尽管他毫无疑问地知晓报纸上每一个应该知道的话题（就像拉迪克、布哈林还有其他人一样），他对于现实的材料缺乏实际的了解，这使他的理论产生谬误。鲍罗廷应该已经在四月份在汉口宣布苏维埃共和国了，是吗？那么，确切地说，怎么做呢？

让我们把假设更进一步展开。已经宣称权力归苏维埃，资产阶级被剥夺公民权，生产机器、银行存款和商业贸易被接管。接下来发生的就是中国资本流入外国银行——不是那些已经在那里的中国资本——一半的生产厂家将升起外国旗帜。（这不是猜测，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不论任何政治事件稍微触动中国神经的时候就会发生。）那么，要实

行无产阶级专政，你就必须没收外国人全部或部分财产。不这么做共产主义就不可能。但是当你没收或认真地干预任何属于外国人的财产之时，你就陷入困境之中，没有回头的余地了；外国海军充斥着江面，外国政府震怒，外国水兵在大街上走动，不出24小时，你的共产主义政府，你的无产阶级专政，就已经淹没在血泊中了。

没有真正看到过中国的沿江城市的人很难相信英国、日本、法国和美国的海军要对它们进行威慑是多么容易。所有这些城市都沿江而建，依赖着江水，为江生存，也靠江生存。我现在比这江还要中国化。江水很适合航行，甚至大的巡洋舰都可以上行至汉口，炮艇可以开到重庆和宜昌。因此，中国沿扬子江的地方只能在理论上被认为是独立的，如果地图是根据事实而不是政治想象来绘制的话，中国地图将是被外国江河所贯穿的。

蒋介石鲍罗廷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些现实，就像它们是被描画在一块黑板上一样。他知道中国的近水地区受外国舰船的支配，只有当欧洲海军撤出扬子江才有希望。他曾试图跳过汉口而转向北平：那是他1926年秋天的计划，如果蒋介石已经实行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在鲍罗廷建议下所做的决定），直到整个中国都被占领并统一起来，南京和上海不会受到任何袭击。但是蒋介石，对他来说南京和上海早已像诱人的果实，没有遵从他的指示，后来，在能够得手之时，通过宣称脱离中央组织和鲍罗廷，摘下了成熟的果实，满足了自己。扬子江，一直以来都使每一场大众的革命运动归于失败，1927年又胜利了，在4月和5月——也就是根据托洛茨基派的理论，鲍罗廷应该已经

迫使或者说服他的中国主顾宣布无产阶级专政的那两个月，中国革命已经成为废墟一片了。

我经常见到鲍罗廷。随着了解他更多，并克服了先前压制我的在他面前觉得无聊和毫无意义的感觉，我可以和他谈论任何事情。后来，当他因患疟疾而卧病在床的时候，我常常每天都去看他；尽管这些拜访过程中所谈论的话题范围非常广泛，涉及了很多跟中国革命毫无关系的内容，他所表现出来的智慧却总是那些受过训练的布尔什维克才有的——他的思维模式是列宁主义的。不论他是在讨论一本新书（《埃尔默·甘特里》*Elmer Gantry* 是那时他感兴趣的一本），或是一个老旧的政治理论，不论是在回忆还是在分析，是在讲故事还是在展开假设，他都用“长远的观点”。我之前从没有如此接近地审视这样的头脑，毫无疑问它的思路清晰和前后连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我不认为鲍罗廷的影响左右了我的任何看法；我太老了也太独立，不会接受别人对任何现象的想法，如果我自己很容易就观察到这些现象。确实发生的是有一点更加复杂的事情。在鲍罗廷身上，我看到了比我自己更年长，更遵守纪律，受过更好训练，更有经验的智慧：它已经走到了我的前面。有时鲍罗廷可以从混淆复杂的外部事件中理出一条原理来并向我指出来；有时他能够指出一个历史方向或是一个主要的趋势。他从未意图将他的意志强加给我——事实上，他谈话的时候经常好像我根本不在房间里面。他关心真理，谈话的主题是找出并展示真理。因此，如果我发现和他的每一次对话都能受到启发，最终以更接近于他对中国革命的观点来处理问题的话，那不是因为他所产生的

任何个人的影响，而是因为真理本身，在我看来，在他那一边的。

在汉口还有很多影响，我曾经受到它们的影响，但它们并没有最终达到效果。陈友仁经常用冗长的、傲慢的句子跟我说话，即使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也是这样。我对他了解更多了一点：但却丝毫对我没有任何影响。美国和英国的商人、海军人官、通常大多外国人，经常对着我夸张地大谈他们受了多少不公平的待遇，很多中国革命者也是这样。但在外国人中，个人动机是那么地明显，因此，对于他们的叙述，不可能很尊重地看待。他们每个人都只看见眼皮底下这点东西。我喜欢和这些商人打牌，听他们发牌时漏出来的观点，或和海军的人一起喝威士忌，了解他们意图谋害中国人的残忍暴行；但是这种消遣毕竟只是消遣。

中国革命者愿意自我牺牲，愿意忍耐，愿意坚持到底，忠诚于自己的理想，即使这些理想对于中国意味着生，而对他们则意味着死，这些都常常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但是没有中国革命者使我有新的看法，而我相信鲍罗廷曾经做到了。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我从没遇到过中国革命的睿智的领导人。孙中山三年前在我来中国前就死了，他的书面著作多我来说缺乏逻辑性——总的来说，缺乏一种真正的长远的观点。当代中国其他的伟大革命领袖都表示追随孙中山或李大钊的教诲，偶尔还有孔子或基督教的色彩。他们中的一些人品格令人敬佩，像孙夫人；其他的引人注目或是性格独特，像汪精卫，是热烈的、浪漫革命者的类型；还有其他一些人很受我个人喜欢和尊重，像宋子文；但是巧的是我从没遇到过一个中国知识分子能够像鲍罗廷那样将对历史的观点谈

释成绝对的真理。

即便如此，也不是鲍罗廷个人，而是由鲍罗廷所解释的中国革命，给了我对中国革命精神的总体上最初的认识。鲍罗廷本人，在纸上谈兵，只是一个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从他整个中国群众运动的关系中，从他既作为领导天才又作为解释者的广大而复杂的动乱中，他成了伟人。他的镇静或许是一种天生的性格，但在混乱和危险当中就显得出奇地高尚；他的政治理论也许就和几何学一样简单（毕竟，在莫斯科列宁学院，教授这个）但是当它被用来支持别的毫无意义的事件的时候就似乎是深奥的、不容辩驳的。他用自身证明，也用他周围的现象指出了知识连贯、社会哲学、无私忘我，以及努力形成所谓的革命精神（我这么说是因为缺乏更确切的说法）的决心等这些特性。

从广东军进城到7月5日革命政府垮台，那种精神在汉口非常普遍。在中国人和俄国人、国民党左派组织者以及共产党人、工人、学生和革命活动者身上都能看到这种精神，当然，不是在他们所有人身上，但是足以确定在中国的混乱中确有一些新的东西存在，有共产主义学生，他们有些来自有钱人家，成为苦力，以便能够组织苦力进行革命。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女孩冒着生命危险，告诉工人和农民们谁才是他们真正的敌人。这些女孩中有一个——在汉口我们都知道她——7月21日在汉口被蒋介石的士兵掏出了肠子，因为她说南京军阀并不代表孙中山的党或原则。她被活着掏出了肠子，绕在她身体上。男孩女孩们因为说出了他们相信的事而被砍头；男人们被吊在木笼子里死于饥渴或脊梁被打断。小Phyllis Li，英雄李大钊17岁的女儿，被张作霖的人折磨了三天三

夜，后被扼死了，算是仁慈对待了，整个过程中她什么也没告诉他们。反革命的恐怖事件并不是什么意料之外的事情：这些年轻的中国人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什么，他们一往前行。促使他们为了这一事业献出生命的动力不是对于涅盘的那种自杀式的、神经质的渴望，就像印度或日本类似危机中的那样。这种神秘的激情，就我所见所闻，对中国来说是未知的。中国人依据更为冷静，更为单纯的信念来行事，相信为了理想而勇敢地牺牲是宣传这一理想的最好方法。在中国，经常是个人为了种族而牺牲，年轻男女为了未出生的一代而牺牲。

在这种英雄奉献的极端形式方面，中国人超过了其他民族。在革命的黑暗岁月中，在背信弃义和胆小怯懦的例子中至少有一个忠诚与勇气的例子。但是其他活动者，特别是俄国人，会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证明这种精神。这不是那么明显的英雄主义方式，因为俄国人认为一个革命者的职责是为了他的事业尽可能地保护自己的生命。一个俄国活动者就应该为了革命而活着，而不是为了它去死。所以即使他可能愿意留下来面对的时候，也得躲避风险，改变他的名字、外表、他的护照，以及他对外公开的营生。在中国，也有些俄国人的生活就像不列颠中文出版社（*British-Chinese Press*）出版的“革命（*revelations*）”中描述的那样充满冒险，尽管不是那种十分廉价的恐怖小说。

鲍罗廷在他的妻子法尼亚鲍罗廷（Fanny Borodin）被北方反革命关押起来的那几个星期里，显示了对个人目的的铁腕控制。鲍罗廷夫人在去海参崴（Vladivostok）与鲍罗廷会合的路上被山东军阀张宗昌的士兵抓住。张把她关了几个星期，后来交给了他

的顶头上司，东北强盗张作霖，张当时在日本人的支持下掌管着北京。张作霖，在当时任何中国人看来都是个嗜血的暴君，他第一个决定就是不经过任何形式就扼杀鲍罗廷夫人。一些在北京的外国人劝阻了他，他们说如果对这位夫人进行审判，会给外国人以更好的印象。我以后还会再讲鲍罗廷夫人的事，这里我们关心的是这些事件在四月和五月，在汉口对鲍罗廷产生的影响。他没有显示出任何愤怒和激动的迹象，尽管人有攻击的本性。他只不过指出鲍罗廷夫人没有参与中国任何共产党的工作，她没有参与政治，张作霖是借机报复——老红胡子没地方发泄他的怒气，就转向无辜的人质：她仅仅因为一个原因而入狱，而面对死亡的危险：那就是她的名字是鲍罗廷。

那种热情的但是非个人的奉献，我称之为“革命精神”。在汉口很多人和事上都很明显，我只是提了他们当中很少几个。有一个人，后来表明比其他人对我更重要，是具有这种精神的，更有意义，更值得纪念的人，我指的就是雷娜·普罗梅。我们相识之后的那种轻率浮躁持续了几个星期，但是不久以后，我开始有一种不安的感觉。我对她的判断非常不准确，简直有点可笑。我有很多小的发现，使我最开始的想法动摇了。总的来说，她没有对“事业”的狂热，也从不是我起先认为的那种浪漫的爱管闲事的人。她受过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良好教育；我还在学跳狐步舞的时候她已经对社会革命产生了兴趣。在为国民党工作的过程中，她已经积累了很多革命经历，1927年春天，她得到了所有中国左派领导人的信任。她不仅编辑官方报纸，还就汉口当局对外宣传事宜发挥着顾问的作用。鲍罗廷、孙夫人、陈友仁和孙

科尊重她的意见。我还是不能把她看成一个革命者——那就像是让我相信跟我一起长大的表妹塞西莉亚（Cecilia）突然之间变成赤色分子一样——但是我不得不承认，这一革命时期，虽然可能是暂时的，对于一个富有魅力的美国女孩子来说，是一次有趣的，意想不到的个性的发展。我养成了每天去看她的习惯，我了解她越多，越在很多事情上依赖于每日的拜访——不仅是为了和一个完全跟我说同一种语言的人交谈所产生的那种愉悦，也为了我作为一名记者的日常工作，去了解新闻，也尽可能了解这些新闻意味着什么。我发现，雷娜·普罗梅的特别之处，就是她非常讨厌说谎，而且彻底地讨厌。实际上，她非常不善于说谎，尽管有时让事情看起来有点人为的色彩是她的职责，她太率直了，根本做不到。当她说到有些连她自己也不相信的事情的时候，我总是能觉察出来：她的表情透露了一切。她从鲍罗廷和陈友仁那里获得指示；尽管鲍罗廷是高度尊重事实，如我所认识的那些公众人物一样小心翼翼地避免背离事实真相，而陈友仁就不是这样了。所以，为了宣传目的，雷娜·普罗梅经常被迫说和写一些她率直的性格所憎恶的东西。官方报纸上是这些陈述，但她谈话之中却不能让它们令人信服。后来她不再给我关于任何事情的官方的说法，要么告诉我简单的真相，要么苦笑着坦言她不能说。在汉口这样的地方，对于我这样的职业，有人可以让我毫无保留地相信，这是很难得的事情。

我到汉口一个星期左右，她的丈夫比尔·普罗梅回到了汉口，但我们并没有如预料当中那样合得来。他有狂热的革命激情，不喜欢我那资产阶级的毫无生气、我那数

不清的白色丝绸衣服、我的苏格兰威士忌和埃及香烟。反之，我不喜欢他兴奋的热情，他拒绝以一种冷静的、逻辑的方式讨论一个话题；我怀疑他的革命信仰不是完全植根于经济和社会科学的——他是个情绪化的赤色分子，如果是的话；他以现在的角色出现在中国是因为他碰巧和雷娜·普罗梅结婚了。部分是出于这些原因，部分是因为他不在这里，因为他的病，我们碰面并不多，在汉口我对他都不怎么了解。在我离开中国和俄国很久以后，我才学会尊重他的智慧并珍惜与他的友谊。在这一章节所涉及的这段时期里，他对我来说是一个相当模糊的形象，他的名字也没有在我日记中的记录中出现过。

雷娜的助理是一个美国女记者，她视我在《人民论坛报》办公室里的每一个时刻都是灾难。在这些情形下，可能不适合谈论一个更敏感的话题，但是我没有这么做。每日同雷娜·普罗梅的交谈成为一种需要，如果有一天我没见到她（如她生病的两次），我会感到格外空虚和不舒服。既然如此，记得我几个月之后才理解她对我的重要性就显得很奇怪，把它记录下来就更奇怪了。我就像约戴因（M. Jourdain）和他的散文一样愚蠢；对于个人的影响我以前从不盲从，但现在我已经受到了最有力最重要的个人影响，只是我还不知道。

那时，汉口——总而言之——是一派不可思议的革命景象，在汉口，中国革命活动者的勇气和奉献，俄国人的巧妙，工人们的奢望和狂热的决心，以及像孙夫人、鲍罗廷和雷娜·普罗梅等人的个人人格魅力，结合在一起让我对一个新世界有了惊鸿一瞥。不从成就上来说，至少从精神上来说，它是一个列宁的世界。经济学和社会学从原来

的死气沉沉变得如此富于生命力是我六个月前在巴黎时从不相信的，那时似乎本世纪最重要的事件就是《佩丽亚斯和梅里桑德》（*Pelleas et Melisande*）在喜歌剧院（Opera Comique）的年度献演。但是对列宁新世界的这一瞥确实让我如触电般激动，这些景象中的人物引发了我最诚挚的敬佩，不过我依然不向它们的逻辑投降。在我看来，整个革命的思维体系是一系列无法证明的假设。当革命的基本问题被诠释为一个简单的三段论的时候，这点就很明显了。像这样：

受约束的平等主义经济是理想的；

革命是实现受约束的平等主义经济的唯一出路；

因此革命是理想的。

这样一个三段推论法中唯一不需要抗辩的部分就是主术语理想的。大前提，尽管有可能，但还是不能被证明的，因为即使在俄国，受约束的平等主义经济模式也是不存在的。小前提同样站不住脚；它可能是对的，也可能不是，但是不能被检验。因此，结论就得靠信念，或有两种可能的结果。

革命的逻辑可以被诠释为其它更有说服力的推论；事实上，后来雷娜·普罗梅和我经常花上几小时将革命的基本公式归结为最简单明了的说法；但在汉口期间，我给出的推论在我看来似乎是对的，不论我对革命者有多么同情，多么敬仰，我还是不能同意他们的信念。正如我说过的，不容质疑的一件事就是在一个混乱的世界需要有某种东西；如果人类要证明智慧的存在就得找到能从混乱中带来秩序的东西。但是是否这一理想的东西就是革命在我看来没办法验证，最感动我的革命景象仍然是那些，没有别的了。



Soong Ching Ling Memorial Residence in Shanghai